

教 研 参 政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50 期）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学习资料专辑

要 目

-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一带一路”：造福全人类的“世纪工程”
- “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 “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应对
-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进展、成果和前景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馆主办

2017 年 7 月

教 研 参 考

二〇一七年第三期（总第五十期）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馆主办

目 录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学习资料专辑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习近平（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7）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	（1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综述	梁建武 司文（17）
“一带一路”建设在新起点上扬帆远航	王毅（23）
“一带一路”：造福全人类的“世纪工程”	（27）
用合作共赢理念引导“一带一路”建设	刘建飞（33）
“一带一路”建设谱写中国对外关系新篇章	高祖贵（37）
“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钟飞腾（40）
“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应对	傅梦孜 徐刚（54）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进展、成果和前景	骆永昆（59）
用钉钉子精神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67）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72）

统计数据

习近平“大数据”描绘丝路远景	（77）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	（78）
数据解读：“一带一路”成国际贸易新引擎	（82）
大数据解读：“一带一路”助力各省区市对外贸易发展	（83）

图片资料

图解：习近平纵论“一带一路”	（84）
图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	（85）
图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大工程项目盘点	（86）
“一带一路”详尽图解	（87）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2017年5月14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部长，
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在这美好时节，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期待着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让这一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千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和平合作**。公元前140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

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开放包容**。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酒泉、敦煌、吐鲁番、喀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古城，宁波、泉州、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阿拉木图、撒马尔罕、长安等重镇和苏尔港、广州等良港兴旺发达，罗马、安息、贵霜等古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古丝绸之路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2013 年秋天，我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4 年来，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这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的 4 年。我多次说过，“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中国同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本次论坛期间，我们还将签署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同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是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的 4 年。“道路通，百业兴。”我们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

——这是贸易畅通不断提升的 4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我了解到，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农产品到达中国市场的通关时间就缩短了 90%。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建设 56 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11 亿美元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

——这是资金融通不断扩大的 4 年。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 9 个项目提供 17 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 40 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这是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的 4 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 1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们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丰硕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人说，“万事开头难”。“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里，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古丝绸之路，和时兴，战时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经是“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却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着力化解热点，坚持政治解决；要着力斡旋调解，坚持公道正义；要着力推进反恐，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

第二，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产业是经济之本。我们要深入开展产业合作，推动各国产业发展规划相互兼容、相互促进，抓好大项目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机遇，培育新业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

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我们要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我们已经确立“一带一路”建设六大经济走廊框架，要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完善跨区域物流网建设。我们也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

第三，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我们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要有“向外看”的胸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

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然，我们也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第四，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搞好“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向创新要动力。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我们要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我们要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年打造创业空间、创业工厂，成就未来一代的青春梦想。

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我们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要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我们要加强各国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促进包容发展。我们也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中国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中国已经同很多国家达成了“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协议，其中既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等硬件联通项目，也包括通信、海关、检验检疫等软件联通项目，还包括经贸、产业、电子商务、海洋和绿色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规划和具体项目。中国同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将签署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我们将推动这些合作项目早日启动、早见成效。

——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 3000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

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我们还将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中国将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促进同各相关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助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将同 30 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4 项行动。我们将在未来 5 年内安排 2500 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 5000 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 50 家联合实验室。我们将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

——中国将在未来 3 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我们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 100 个“幸福家园”、100 个“爱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我们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中国将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我们将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古语讲：“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阿拉伯谚语说，“金字塔是一块块石头垒成的”。欧洲也有句话：“伟业非一日之功”。“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祝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摘自新华社 2017 年 5 月 14 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 联合公报

1、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捷克总统泽曼、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俄罗斯总统普京、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柬埔寨首相洪森、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利亚姆、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蒙古国总理额尔登巴特、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波兰总理希德沃、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我们也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出席。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主持。

时代背景

2、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各国都在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国际发展合作描绘了新蓝图。

3、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各国积极开展双边、三方、区域和多边合作，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市场化产业转型，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各国发展战略和互联互通合作倡议层出不穷，为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4、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虽在缓慢复苏，但下行风险犹存。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依然低迷，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待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

5、我们注意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挑战和变革中创造机遇，我们欢迎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加强亚欧互联互通，同时对非洲、拉美等其他地区开放。“一带一路”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倡议，为各国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取

得了积极成果，未来将为各方带来更多福祉。

6、我们强调，国际、地区和国别合作框架和倡议之间沟通协调能够为推进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合作机遇。这些框架和倡议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非洲 2063 年议程、文明古国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亚欧会议及其互联互通工作组、商旅驿站关税倡议、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欧海陆快线、中间走廊倡议、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平台、欧盟东部伙伴关系、以平等、开放、透明为原则的欧亚伙伴关系、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欧亚经济联盟 2030 年经济发展基本方向、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跨欧洲交通运输网、西巴尔干六国互联互通议程、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等。

7、我们重申，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将努力促进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

合作目标

8、我们主张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各种发展战略的国际合作，建立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9、我们重申，在公平竞争和尊重市场规律与国际准则基础上，大力促进经济增长、扩大贸易和投资。我们欢迎推进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中小微企业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发挥税收和财政政策作用，将增长和生产性投资作为优先方向。

10、我们主张加强各国基础设施联通、规制衔接和人员往来。需要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有效互联互通。

11、我们致力于扩大人文交流，维护和平正义，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促进民主、良政、法治、人权，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更好应对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诉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确保所有人公平享有发展机遇和成果。

12、我们决心阻止地球的退化，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鼓励《巴黎协定》所有批约方全面落实协定；以平等、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自然资源，保护并可持续利用海洋、淡水、森林、山地、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野生生物，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综合、平衡、可持续发展。

13、我们鼓励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广大民众共同参与，建立巩固友好关系，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合作原则

14、我们将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平等透明、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本着法治、机会均等原则加强合作。为此，我们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和政策，强调以下合作原则：

(1) 平等协商。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基本准则；

协商制定合作规划，推进合作项目。

(2) 互利共赢。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兼顾各方立场。

(3) 和谐包容。尊重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所有文化和文明都能够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4) 市场运作。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

(5) 平衡和可持续。强调项目的经济、社会、财政、金融和环境可持续性，促进环境高标准，同时统筹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合作举措

15、我们重申需要重点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强调根据各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义务，采取以下切实行动：

(1) 加强对话协商，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注意到“一带一路”倡议与第六段所列发展计划和倡议协调发展，促进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之间伙伴关系的努力。

(2) 就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完善现有多双边合作对话机制，为务实合作和大型项目提供有力政策支持。

(3) 加强创新合作，支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科技园区等领域的创新行动计划，鼓励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加强互联网时代创新创业模式交流。

(4) 推动在公路、铁路、港口、海上和内河运输、航空、能源管道、电力、海底电缆、光纤、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欢迎新亚欧大陆桥、北方海航道、中间走廊等多模式综合走廊和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构建国际性基础设施网络。

(5) 通过借鉴相关国际标准、必要时统一规则体制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实现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协同效应最大化；为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有利、可预测的环境；在有利于增加就业、提高效率的领域促进公私伙伴关系；欢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和投入。

(6) 深化经贸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和效力；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第 11 次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让普通民众从贸易中获益。

(7) 通过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方式扩大贸易，欢迎有兴趣的国家开展自贸区建设并商签自贸协定。

(8) 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和供应链联接，同时确保安全生产，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双向投资，加强新兴产业、贸易、工业园区、跨境经济园区等领域合作。

(9) 加强环境、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抗灾、减灾、提高灾害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等领域合作。

(10) 加强通关手续等方面信息交流，推动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加强海关合作，通过统一手续、降低成本等方式促进贸易便利化，同时促进保护知识产权合作。

（11）合作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体系；加强金融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投融资模式和平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探寻更好服务本地金融市场的机会；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

（12）为构建稳定、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作贡献；通过推动支付体系合作和普惠金融等途径，促进金融市场相互开放和互联互通；鼓励金融机构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推动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和合作协议，发展本币债券和股票市场；鼓励通过对话加强金融合作，规避金融风险。

（13）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纽带，深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智库、媒体以及包括实习培训在内的能力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

（14）鼓励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文化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愿景展望

16、我们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互联互通倡议对接的努力，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

17、我们重申，促进和平、推动互利合作、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构建繁荣、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18、我们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摘自新华社 2017 年 5 月 15 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倡议。3 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国际盛会，也是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的重要合作平台。高峰论坛期间及前夕，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中方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形成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清单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5 大类，共 76 大项、270 多项具体成果。

一、推进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

（一）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包括蒙古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

（二）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三）中国政府与匈牙利政府签署关于共同编制中匈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老挝、柬埔寨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双边合作规划。

（四）中国政府部门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文明联盟、国际发展法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

（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希腊经济发展部签署《中希重点领域 2017—2019 年合作计划》。

（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捷克工业和贸易部签署关于共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规划及项目实施的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财政部与相关国家财政部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推动“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文件。

(九)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定期举办,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等。

(十)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发布海上丝路贸易指数。

二、深化项目合作,促进设施联通

(一) 中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政府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

(二) 中国政府与泰国政府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

(三) 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水资源领域谅解备忘录。

(四)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巴基斯坦规划发展和改革部签署关于中巴经济走廊项下开展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连陆港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铁路局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签署关于实施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哈维连陆港项目建设的框架协议。

(五) 中国商务部与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签署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六)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阿富汗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签署《信息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七) 中国交通运输部与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等国有关部门签署“一带一路”交通运输领域合作文件。

(八) 中国水利部与波兰环境部签署水资源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九) 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瑞士环境、交通、能源和电信部瑞士联邦能源办公室签署能源合作路线图,与巴基斯坦水电部签署关于巴沙项目及巴基斯坦北部水电规划研究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清单调整的协议。

(十) 中国国家海洋局与柬埔寨环境部签署关于建立中柬联合海洋观测站的议定书。

(十一) 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有关国家铁路公司签署《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铁路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

(十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中国高铁有限公司签署雅万高铁项目融资协议,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老挝、埃及等国有关机构签署港口、电力、工业园区等领域基础设施融资合作协议。

(十三)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财政部签署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贷款协议,与柬埔寨经济财政部、埃塞俄比亚财政部、哈萨克斯坦国家公路公司签署公路项目贷款协议,与越南财政部签署轻轨项目贷款协议,与塞尔维亚电信公司签署电信项目贷款协议,与蒙古国财政部签署桥梁项目贷款协议,与缅甸仰光机场公司签署机场扩改建项目贷款协议,与肯尼亚财政部签署内陆集装箱港堆场项目贷款协议。

（十四）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互联电网管理局签署能源领域合作备忘录。

三、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

（一）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马尔代夫、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波黑、黑山、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塞尔维亚等 30 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

（二）中国政府与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文件。

（三）中国政府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署关于促进投资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四）中国政府与阿富汗政府签署关于海关事务的合作与互助协定。

（五）中国商务部与 60 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共同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六）中国商务部与摩尔多瓦经济部签署关于结束中国—摩尔多瓦自贸协定联合可研的谅解备忘录，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启动中国—蒙古国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商务部与尼泊尔工业部签署关于建设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与缅甸商务部签署关于建设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

（八）中国商务部与斯里兰卡发展战略与国际贸易部签署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加强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签署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规划，与捷克工贸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签署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越南工业贸易部签署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九）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与阿联酋经济部签署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十）中国农业部与塞尔维亚农业与环境保护部签署关于制定农业经贸投资行动计划的备忘录，与阿根廷农业产业部签署农业合作战略行动计划，与智利农业部签署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的五年规划（2017 年—2021 年），与埃及农业和土地改良部签署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十一）中国海关总署与哈萨克斯坦、荷兰、波兰等国海关部门签署海关合作文件，深化沿线海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

（十二）中国海关总署与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签署促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及实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合作文件。

（十三）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挪威、爱尔兰、塞尔维亚、荷兰、阿根廷、智利、坦桑尼亚等国相关部门签署检验检疫合作协议，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相关部门签署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领

域合作协议，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蒙古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希腊、瑞士、土耳其等国有关部门签署《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倡议》。

（十四）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白俄罗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老挝、肯尼亚、蒙古国、巴基斯坦财政部门签署工业园、输变电、风电、水坝、卫星、液压器厂等项目贷款协议，与埃及、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沙特有关企业签署电网升级改造、燃煤电站、煤矿改造、轮胎厂等项目贷款协议，与菲律宾首都银行及信托公司签署融资授信额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十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有关机构签署化工、冶金、石化等领域产能合作融资合作协议。

（十六）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四、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资金融通

（一）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初步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三）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设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首期100亿元人民币，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

（四）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6家多边开发机构签署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五）中国财政部联合多边开发银行将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六）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投入实际运作，签署支持中国电信企业参与“数字哈萨克斯坦2020”规划合作框架协议。

（七）丝路基金与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同意签署关于伙伴关系基础的备忘录。丝路基金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对外经济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专项贷款（500亿元等值人民币）。

（九）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额度（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额度（300亿元等值人民币）。

（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共同投资中国—法国中小企业基金（二期），并签署《股权认购协议》；与意大利存贷款公司签署《设立中意联合投资基金谅解备忘录》；与伊朗商业银行、埃及银行、匈牙利开发银行、菲律宾首都银行、土耳其农业银行、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柬埔寨加华银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开展融资、债券承销等领域务实合作。

(十一)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马来西亚进出口银行、泰国进出口银行等“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成员机构签署授信额度框架协议，开展转贷款、贸易融资等领域务实合作。

(十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波兰、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同业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与埃及投资和国际合作部、老挝财政部、柬埔寨财政部、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波兰投资贸易局、肯尼亚财政部、伊朗中央银行、伊朗财政与经济事务部等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及沙特阿拉伯发展基金、土耳其实业银行、土耳其担保银行、巴基斯坦联合银行等有关国家金融机构签署框架协议。

(十三) 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基金组织—中国能力建设中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培训。

(十四)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关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工业发展有关合作的联合声明。

(十五)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正式成立。

(十六) 中国工商银行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奥地利等国家主要银行共同发起“一带一路”银行合作行动计划，建立“一带一路”银行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

五、增强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

(一) 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3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

(二) 中国政府将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支持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共同推动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向沿线国家提供100个食品、帐篷、活动板房等难民援助项目，设立难民奖学金，为500名青少年难民提供受教育机会，资助100名难民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区域赛事活动。

(三) 中国政府与黎巴嫩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2017—2020年执行计划》，与突尼斯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四) 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谅解备忘录(2017—2020年)》。

(五) 中国政府与波兰政府签署政府间旅游合作协议。

(六) 中国政府倡议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实施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项行动。

(七) 中国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

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签署援助协议。

(八) 中国教育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黑、爱沙尼亚、老挝等国教育部门签署教育领域合作文件，与塞浦路斯签署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协议，与沿线国家建立音乐教育联盟。

(九) 中国科技部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共同实施中蒙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在蒙古国建立科技园区和创新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匈牙利国家研发与创新署签署关于联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十) 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布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倡议。

(十一) 中国财政部将设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十二)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捷克、挪威等国卫生部签署卫生领域合作文件。

(十三) 中国国家旅游局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签署旅游合作协议，与智利经济、发展与旅游部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与柬埔寨旅游部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实施方案。

(十四)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沙特阿拉伯视听管理总局签署合作文件。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有关国家主流媒体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十五)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柬埔寨新闻部、文莱首相府新闻局、阿联酋国家媒体委员会、巴勒斯坦新闻部、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传媒和公民关系局签署媒体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文莱外交与贸易部政策与战略研究所、以色列外交部、巴勒斯坦外交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签署智库合作促进计划谅解备忘录。

(十七)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举办“一带一路”专项双多边交流培训，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

(十八)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 80 多家中国民间组织启动《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 150 多家中外民间组织共同成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启动“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目”。

(十九)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丝路国际智库网络 50 多家国际成员和伙伴与中方共同发布《丝路国际智库网络北京共同行动宣言》。

(二十) 中国国际城市发展联盟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城市 and 地方政府组织亚太区签署合作意向书。

（摘自新华社 2017 年 5 月 15 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综述

梁建武 司 文

2017年5月14-15日，29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代表和70多个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此次论坛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高级别会议和领导人圆桌峰会三大部分。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一带一路”的过去和未来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新作为，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在此后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和领导人圆桌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及代表分别围绕6个平行主题、双边和多边合作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向论坛建言献策，并最后达成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

一、习主席阐释“一带一路”内涵和新作为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国际社会对其存在诸多困惑和不解。一是不清楚“一带一路”的定位和意图。如在2016年11月30日中华能源基金会和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联合主办的“美中一带一路论坛”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指出，关于“一带一路”的信息厘清、交流还远远不够。二是国际社会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布局，引发部分国家的猜忌与警戒，认为中国企图借此掠夺当地经济资源、扩大全球影响力。如，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挤压了印度的战略空间。三是担忧中国污染程度高、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借助“一带一路”外移，破坏沿线国家环境。四是对有领土纠纷的国家来说，“一带一路”所强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五是中小国家担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会被中国主导。对此，习主席借助高峰论坛释疑解惑，让世界放心。

（一）第一次全面阐述“一带一路”的合作范围和最终目标。习主席在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表明，中国在对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三大挑战长期思考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但不局限于这些沿线国家，它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也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伙伴。习主席在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开幕辞中指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在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二）掷地有声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六个“不”，缓解各国疑虑。“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是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三）娓娓道来“一带一路”建设四年来取得的成果，给全世界树起信心。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其建设成果丰硕。一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中国已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论坛期间还将签署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二是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三是贸易畅通不断提升。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四是资金融通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五是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了合作。

（四）明确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使命和新作为，让全世界心动和行动。习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要乘势而为、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首先，高峰论坛的召开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赋予其新的使命。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事业，要将其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其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作为呈现为细化的数字。如，加大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的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重视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未来五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最后，新作为更贴近民生。四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新时期“一带一路”将更注重沿线民众的生活日常。如，未来三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的民生项目；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二、沿线及相关国家、国际组织深化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许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部分国家已与“一带一路”稳步对接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他沿线及相关国家也纷纷表达出参与意向。不仅如此，

国际机构也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愿意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这一伟大的事业和实践。本次高峰论坛上，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对接、合作得到进一步升华，达成双边或多边成果共计 59 大项。

（一）沿线及相关国家对接全面展开。一是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自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已成为近年来沿线及相关国家的共识。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分别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欧洲“容克计划”、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等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对接。2015 年 5 月，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5 年 6 月，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和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成立，分别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计划”、“泛欧交通运输网”。2016 年 9 月，中哈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与此同时，蒙古国“草原之路”、越南“两廊一圈”、柬埔寨“四角战略”等也正加快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此次高峰论坛上，中国与多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就宏观战略合作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与蒙古国等 11 国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表达了合作意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希望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倡议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称，“一带一路”倡议和菲律宾目前正在推进的“2017—2022 发展规划”十分契合，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菲律宾愿将该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对接，加深两国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也表示愿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强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

二是发展规划对接。除宏观层面的合作共识外，中国还与多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就具体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主要覆盖设施建设、贸易往来、金融合作以及人文社会四类共计 52 大项，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阿根廷驻华大使盖铁戈会前表示，阿根廷愿意从两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是阿根廷希望成为亚投行的一员，参与投资大型基础设施。亚投行及其覆盖全世界的通信网有助于“一带一路”突破区域限制，并囊括拉美地区的大型基建项目。二是参与中国与包括非洲及中亚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在基建、科技和食品供应相关领域。三是机制平台对接。为推动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络沟通及对接，沿线及相关国家正逐步完善机制化平台建设。2016 年 12 月，马来西亚“一带一路”中心在吉隆坡成立，旨在帮助马来西亚工商界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把握合作发展契机。该中心主要负责开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调研工作，为企业提供咨询，协助企业开拓市场并在政府和企业间进行商业对接。2017 年 4 月，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在索非亚成立，旨在进一步加强中保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合作。保加利亚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奥尔贝佐夫表示，该联合会将在推动保政府部门和公众更全面地了解并参与“一带一路”方面发挥强有力作用。5 月，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波廷杰在参加高峰论坛时透露，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国企业已共同成立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小组，它将在中美合作中充当联络点角色。同月，涵盖印尼、中国、马来西亚三国商界的“一带一路”总商会在印尼成立。总会长印尼前驻华大使易穆龙表示，未来该商会还将拓展到东盟其他成员国，以求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二）国际组织充分肯定并给予支持。一是“一带一路”内涵获国际组织认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国际发展的共同愿景，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高度吻合，将惠及整个世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区域合作、发展与增长的典范，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合作贡献了新模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一带一路”将从三个方面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即在尊重人类发展和环境的基础上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以及促进地区间强有力的经济合作。世行行长金墉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为亚洲及其邻近地区提供更大的连通性。

二是双边及多边合作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联合国的鼎力支持。迄今,中国已与多个联合国机构签署了相关合作文件,其中,2016年9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文件也不止一次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内容。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阿富汗问题第2344号决议更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金墉表示,世行在贸易便利化、道路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机制化等方面积累了不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经验,非常愿意向“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世行已开始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工作:一方面,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学,量化其潜在效益,甄别关键的基础设施瓶颈,针对政策和监管制约因素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同中国、其他国家以及多边开发银行联手发起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和全球连通性联盟,提供项目准备资金和交易结构咨询建议,帮助加快项目准备。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WTO将通过助力“软”基础设施建设参与“一带一路”。如今世界贸易遭遇的一些难题并不是因为道路、港口等硬件缺失,而是与各国政策和海关程序有关,因此需要完善整体框架和管理条例等,这也是WTO擅长的领域。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秘书长翁贝托·德·布雷托表示,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将针对中国的特点,提供国际公路运输系统的相关培训,积极促进跨境道路运输便利化,探索多式联运发展,实现国际道路运输联盟与中国的互利共赢。

三、国际建言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五通”可能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参会各国及国际组织纷纷建言献策

(一) 加强政策沟通。一是**强化机制建设**。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认为,加强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有利于为建设更开放、更稳定和更繁荣的世界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阿联酋国务部长苏尔坦指出,加强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不能昙花一现,要形成机制化。阿联酋愿承办下届对接会议,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繁荣和发展的“催化剂”。二是**完善标准对接**。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建议,共建“一带一路”要突破双边项目制约,促进多边政策框架和标准制订,加强跨部门合作。洛伊特哈德表示,共同的技术标准、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是促进设施联通的重要基础。金墉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能力、制约因素和风险状况也不同,需要制定并达到统一的、令人满意的标准。

(二) 加快设施联通。一是**“硬件”设施是基础**。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阿济莫夫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发达的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这样才能让大量的货物、服务、投资、资本流通起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林基泽表示,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尤其要建立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并且实现可持续的创新。二是**“软件”设施要配套**。阿赫塔尔称:“要最大限度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必须促进区域性和多边政策框架及标准的制定。交通运输、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必须伴随各类协议、各类规则等‘软件’的使用,从而实现经济走廊的无缝对接。同时,应该注重走廊的社会效益,将‘一带一路’连接到偏远地区,帮助缩小城

乡差距。此外，应采取跨部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道路、铁路、光纤电路、电力线及天然气管道统筹考虑，有效提升效率并节约成本。**三是项目质量要跟上。**波廷杰建议，为确保项目能满足投资方和落地国的需求，应做到四个方面，即确保高质量的项目评估、融资、建设和维护，避免落地国一味追求项目而导致日后债台高筑；招投标程序必须透明，以确保私人企业能够公平竞标，避免成本收益偏离，同时也能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协助落地国进行能力建设，鼓励公民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发展，以便增加对外来投资的支持；开放项目并鼓励私人企业广泛参与，这一方面能够摊薄融资风险，另一方面有利于选择能力更强的企业，从而确保项目能够在预算内按期完成。

（三）推动贸易畅通。**一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埃尔多安认为，“一带一路”要取得成功，重在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关税合作，消除非关税壁垒。阿赫塔尔称，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和进口关税有助于经济增长，如跨境交易成本和进口关税降低 30%，将为中国 GDP 增长贡献 1.8 个百分点，其他参与国 GDP 更将额外增长 5.3%—16.9%不等。在运作效率低下的贸易和边境管理体制内，贸易手续简化度、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水平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可分别带来 1.5%、0.7%和 1.4%的出口额增长。翁贝托·德·布雷托认为，中国的贸易便利化在申诉程序、单证简化与协调以及内部边境机构合作方面仍有改善空间。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往来中公路运输的比重仅约 10%，且存在不少制约瓶颈。中国应加快实施国际公路运输系统（TIR），进一步打通“一带一路”沿线运输通道，促进互联互通。据测算，TIR 可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道路运输时间最高节省 80%，过境成本节省 30%。中国每年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将因此增加最多约 135.83 亿美元，占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总额的 1.4%。**二是加快数字联通。**阿泽维多、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均认为，促进贸易畅通，不仅要建设使货物运输畅通无阻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还需要关注宽带网络的互联互通和在线贸易的迅速发展。鉴于目前全球仍有接近半数的人口无法上网，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强调，推进贸易畅通“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考虑到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速度已 5 倍于传统贸易，今后应着力建设“电子丝绸之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遇。

（四）促进资金融通。**一是破解融资瓶颈。**巴基斯坦财长伊沙克·达尔认为，政府可以在解决融资难题中发挥更大作用，如通过改善环境、提供政策框架等，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巴基斯坦专门设立了发展基金，为企业提供种子资金，以吸引其他更多方面的资金。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表示，为“一带一路”争取更多资源不仅要发挥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还要通过金融创新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导致的长期融资问题。亚行首席驻华代表贝内迪克特·宾厄姆认为，要想更大程度地引导私营资本介入，就必须营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和氛围，在增强市场可预见性、承诺可兑现性和消除信息不对称等方面下功夫。格鲁吉亚副总理兼财长库姆西什维利表示，格鲁吉亚通过财政改革来缓解紧张的财政状况，提高直接税比重为其创造了约 8%的额外财政空间。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拉加德认为，要实现综合运用政府、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普通民众的资源，需要建设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金融系统。为实现这一目标，她提出三大政策优先领域。首先，通过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贸易透明度、改善商业和监管环境吸引针对高质量基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其次，加强金融包容性，尤其是要让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小企业和女性能够获得更多金融服务。IMF 分析显示，金融包容性强的经济体增速要快于包容性相对较弱的经济体 2—3 个百分点。再次，运用金融科技的力量。拉加德特别提到，飞速发展的手机银行业改善了孟加拉国、肯尼亚、秘鲁等国亿万人民的经济生活，以虚拟货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也在飞速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科技的飞速

发展还面临诸如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挑战，因此金融科技服务提供方、金融监管者、央行以及全球机构应通力合作，以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和包容性。

三是防范金融风险。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长班邦·布罗佐内戈罗认为，分配项目资金至关重要，需要充分协调各项目计划和预算，一开始就要明确哪些项目由预算提供资金支持，哪些需要私营部门参与融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周期较长，投资过程中必须考虑汇率风险，因此不仅要优先考虑使用本币进行投资，还需考虑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互换安排。

四是利用外部优势。英国财长菲利普·哈蒙德表示，伦敦拥有金融领域专业技术、法律服务和项目设计能力，可在“一带一路”融资中发挥作用。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指出，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之一，在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尤其是东南亚项目方面可发挥作用，如与多边发展银行等伙伴合作，落实项目选择、筹备和构建等工作。此外，新加坡也能够和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私人和商业伙伴合作，设计由多家保险机构共同承担风险的“保险池”机制，减少各个项目的风险，让更复杂和大型的项目也可获得融资。拉加德表示，愿意运用IMF多年的经验帮助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和完善，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支持，如压力时期的资金流波动性管理等。

（五）增进民心相通。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表示，“独行快，众行远”。构建民心相通和促进共同繁荣不能仅仅是一句空话，“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要超越自上而下的交流合作，发展出可持续的、人民之间的交流合作。**一是发挥旅游业带动作用。**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勒塔布·瑞法依表示，旅行更能让不同国家的人互相了解、心存友好和尊重。柬埔寨首相洪森也强调，旅游业在促进民间交流方面影响巨大。**二是沿线国家成立特别小组。**埃及金字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专家穆罕默德·法耶兹认为，埃及等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的关注较多，但社会层面的讨论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可以由沿线较具代表性的国家或者按地区成立若干小组，推动“一带一路”渗透到民间。小组成员除各国政府官员外，还应广泛吸纳商界、学界和文化界等的代表。**三是加强多层级研讨与交流。**上合组织前秘书长梅津采夫建议各国专家每年开展研讨会，探讨如何扩大各国间人文交流，从而加快推进各国之间的民心相通。非洲政党理事会秘书长阿里·纳菲认为，“一带一路”需要政府、政党、机构和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沟通，向社会讲述什么是“一带一路”，如何参与其中并受惠于此。

（摘自《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5期）

“一带一路”建设在新起点上扬帆远航

王毅

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倡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是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出席并主持高峰论坛圆桌峰会。29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圆桌峰会，多国高级官员出席开幕式和高级别会议等活动。与会代表来自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总数约1500人，嘉宾云集、盛况空前，凸显“中国倡议、全球响应、世界共赢”的积极成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合作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一、高峰论坛举世瞩目、成果丰硕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入推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性增多。在此背景下，我国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举办高峰论坛，唱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主旋律，为世界经济增长谋求动力，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振信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路径，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响应，彰显我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的引领作用。

凝聚了广泛国际共识。习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使“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内涵缺乏了解，少数国家对中方意图仍存疑虑。习主席在论坛上积极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系统梳理“一带一路”建设4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刻阐释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生动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源头和发展大势，取得了消疑释惑、扩大共识的显著成效。高峰论坛发表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是首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性、权威性文件，既有理念引领也有行动规划，集中反映了关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目标、原则和举措的国际共识。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习主席描绘的“一带一路”合作蓝图符合国际潮流，前景广阔。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多国领导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长期、宏伟的历史性工程，高峰论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充满智慧和极富远见的战略，不仅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和平。习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演讲犹如火炬照亮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要想富，先修路”、“人心齐，泰山移”等中国俗语，表达对“一带一路”的衷心认同和支持。论坛期间，我国在已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基础上，又与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商签有关合作文件，有力拓展了“一带一路”朋友圈，形成各方合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声势。

明确了共同努力方向。“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展开的新阶段，方向指引、路径规划至关重要。习主席从顶层设计角度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强调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深入开展产业、金融、设施联通合作，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上述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契合各国发展需求，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得到与会各方积极响应。论坛期间，我国同有关国家达成重要共识，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具体路径，把美好的愿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把宏大的蓝图转化为清晰的路线图。

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高峰论坛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线，达成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合作成果，体现了“一带一路”以行动为导向、以项目为落脚点的行动力和实效性。我国同柬埔寨、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多国签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交通运输合作协议，中欧班列合作、雅万高铁和匈塞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显现。我国同30个国家签署政府间经贸合作协议，同格鲁吉亚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同多个国家致力于共建经贸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增添了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内在活力。同泰国、马来西亚、波兰、阿富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签署核能、水资源、电信、科技、环保、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合作协议，有力拓宽了“一带一路”合作领域，让有关国家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各方赞赏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谈，而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以统筹协调、改革创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为特点的合作新模式，将推动各国共同走上发展富裕的新道路。

构筑了完善支撑体系。“一带一路”是着眼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牢固完善的支撑体系。习主席宣布我国将于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设立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方提出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等举措，同多边开发银行建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建设融资指导原则，鼓舞了各方参与“一带一路”的信心和干劲。我国推动建设一批科技、环保、新闻等领域综合性服务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长效支持。中方上述举措赢得广泛赞赏，与会领导人表示这些举措体现了中方作为首倡国的历史担当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各国也应拿出更多实际行动，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拓展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论坛期间，习主席同所有与会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双边会谈会见，有力拓展了以“一带一路”为主干的伙伴关系网络。习主席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各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进一步充实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习主席会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就支持多边主义、推进中欧四大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主席广做周边国家领导人工作，引导其与我国增进互信、扩大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维护周边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习主席还与非洲、拉美等与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亲切交流，深入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机遇，推动我国同各方关系进一步发展。

二、“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高峰论坛集中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描绘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宏伟愿景，彰显了“一带一路”建设对解决人类发展难题、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再出发。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迫切需要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发展引擎。“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以完善基础设施为先导，通过推进“五通”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为各方搭建了一个开放高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各方战略对接有序展开，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开工建设，区域贸易和投资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形成一批早期收获成果并产生示范效应。越来越多国家看好“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机遇和广阔前景，期待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受益。本次高峰论坛在已有基础上又推出一系列重大合作举措，必将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各国共同发展带来更多红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将达到19.6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38.9%。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发展对沿线国家的辐射效应不断增强。2014年至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与世界经济联动融合发展的势头日益强劲。

推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各国面临封闭僵化还是开放合作的重要抉择。“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使各种经济要素冲破地理障碍得到更合理配置，通过提高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重塑世界生产、投资和消费格局，为经济全球化找到可持续的新动能。“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为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勾画了新愿景。

高峰论坛与会各方称赞“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经济全球化、改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让处于经济全球化边缘的欠发达国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朝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加快进发。发达国家代表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走保守、封闭、排他的“回头路”，而是提供了开放、连接、融合的新选择，是新型全球化模式的代表，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地理革命”，体现了卓越的东方智慧。

推动中国国际地位再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内外联动发展的世纪工程。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是我国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新起点。高峰论坛期间，国内16个省区市的代表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高官、企业家等对接交流、商洽合作，为我国地方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抓手。随着我国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协议的逐步落实，我国装备、技术、投资、标准“走出去”将迎来新机遇，为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开辟广阔空间。“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战略紧密衔接，将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东中西部联动发展新局面注入强劲动力。

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的新起点。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高峰论坛成果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扩大了中国理念的世界影响。习主席演讲和发言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得到广泛响应，显著增强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成为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着力点和实践场。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行动，我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引领作用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方向既定，关键在于行动。高峰论坛吹响了“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的号角。我们将以此为契机，集众智、汇众力，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同各方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我们将以落实高峰论坛成果为抓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向前迈进。同各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项行动计划和合作项目落地生根。扎扎实实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深入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进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投资合作水平，打造更多产业带、增长极和经济圈，塑造亚欧大陆联动发展格局，助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着眼“一带一路”建设长远发展，在理论政策、经济金融、体制机制、安全保障等层面加大投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撑体系。汇集政府、企业、智库、媒体、民间等力量，形成各方齐抓共建的强大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我们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打造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网络。我们将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方针，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平等互利合作，把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同各国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伙伴关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以周边为基础，面向亚欧大陆，辐射五洲四海，打造更加紧密强劲、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我们将以合作共赢理念为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原则。我们将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具体化、实践化，同各国一道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一带一路”合奏着历史和现实的壮丽交响，承载着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以高峰论坛为契机，“一带一路”这艘巨轮正蓄满和平发展的能量，扬起合作共赢的风帆，载着各参与方乘风破浪，驶向和平繁荣的美好未来。

（摘自《求是》2017年第11期）

“一带一路”：造福全人类的“世纪工程”

政策沟通：为“一带一路”唱出共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开发司 欧晓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特点不同、发展方式各异、文化传统不一，如何实现联动发展，首要在于政策沟通，即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首，政策沟通是开展各方面务实合作的基础，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对“一带一路”这首沿线各国的大合唱来说，政策沟通唱出了国际社会的共鸣。

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方面不断深化、成果丰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前，我国就先后与4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我们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我们围绕推进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又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签署了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目前，与中国签署共建协议的国家已近70家。各方通过政策对接，进一步增强了政治互信和合作共识。以此为基础，我们将继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开创规划衔接、发展融合、利益共享的新局面。做好政策沟通工作，要重点加强四个层面的对接。

一是发展战略的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是关乎一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抉择和顶层设计，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引领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于自身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它们各有特色，但有很多联系点和相通之处，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是国家间最高层次的沟通与协调，有利于增进政治互信和合作共识，从宏观上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实现相向而行，协同并进。

二是发展规划的对接。发展规划是对发展战略的细化和量化。我们不仅要把“一带一路”建设同有关国家的发展规划对接起来，也要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成果结合起来，同亚太经合组织、东盟、非盟、欧亚经济联盟、欧盟、拉共体等区域发展规划对接起来，进一步明确合作的重点方向和领域，确定合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实现共

同的发展目标。

三是机制平台的对接。在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沟通交流机制的同时，要加快探索各国之间的多层次合作平台建设，将各国有关执行机构的交流、沟通、磋商渠道和机制建立起来，在更大范围内有效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及时解决规划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and 困难。

四是具体项目的对接。项目是实施战略与规划的基本单元和载体，“一带一路”倡议最终需要落实到基础设施、经贸、投资、金融、人文等各领域一个个项目上来。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方向、重点国别和重点项目，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等战略性优先项目的对接。要以企业为主体，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坚持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为企业进行项目合作强化政策保障，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必要帮助。

中国古人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加强政策沟通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步调一致。我们与沿线国家将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形成政策协调、规划对接的合力，使“一带一路”更好服务于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事业，唱响共赢发展的历史最强音！

设施联通：“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基础

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任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利用既有双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等有效平台，在推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和技术标准对接为切入点，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依托，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推动区域交通互联互通不断取得新进展。

“道路通，百业兴。”4年来，设施联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亮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130多个涉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领域的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制定了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中亚区域等交通发展战略规划；通过73个公路和水路口岸开通了356条国际道路及陆海联运客货运输线路；建成了11条跨境铁路；“中欧班列”线路已通达11个欧洲国家的29个城市，国际铁路运邮已初具国际物流品牌影响力。随着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项目、中俄黑河大桥等一批跨境和境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先后落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正在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务实合作的“助推器”，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为例，根据巴方统计，通过实施走廊交通、能源领域互联互通早期收获项目，中国企业对巴基斯坦的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大量建设项目为巴基斯坦创造近2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10万个间接就业机会。在中国企业建设和参与经营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及其港口城和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项目所在地，当地民众无不感受到了“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建设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喜人变化，对未来充满无尽的期待与憧憬。

“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建设虽然取得丰硕成果，但也面临融资瓶颈等突出挑战。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经验分享者和重要建设者，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

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针对融资瓶颈的挑战，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为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有利、可预测的环境，并欢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和投入。

在沿线各国普遍缺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一带一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除利用“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传统政府框架项目合作方式以外，也不断尝试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股权收购等新模式。中国港湾以BOT模式投资建设牙买加南北收费公路并取得50年特许经营权，中远海运成功收购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获得控股经营权——这些实践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成功案例。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千百年来，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薪火相传，在推动沿线国家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了国与国之间的道路，也联通了人与人之间的心路，开辟了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天地，为中国赢得更多朋友与伙伴。我们必将携手走好这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贸易畅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商务部综合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之一，贸易畅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4年来，经贸合作充分发挥基础和先导作用，为实现“五通”注入强大动力。2014年至2016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沿线国家更多的产品、服务、技术、资本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贸易往来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不同，经济互补性强，贸易潜力巨大。我们通过削减壁垒、搭建平台、完善促进进口政策，积极扩大自沿线国家进口，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充分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推动大型成套设备、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满足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支持企业在沿线交通枢纽建立仓储物流基地和分拨中心，完善区域营销网络，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发展与相关国家边境贸易，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旅游、中医药、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中外服务业企业合作。发挥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广交会等展会的平台作用，促进企业互动交流，共享“一带一路”商机。

投资合作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们不断深化管理体制变革，完善促进政策，积极商签政府间投资合作协议，为对外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以对外工程承包为先导，以金融服务为支持，带动装备产品、技术、标准、服务联合走出去。我国已经成为许多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涵盖农林开发、能源资源、加工制造、物流运输、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合作方式不断拓展，从传统的商品和劳务输出为主发展到商品、服务、资本输出“多头并进”。同时，我们不断放宽外资准入领域，探索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营造高标准国际营商环境，吸引沿线国家来华投资。

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截至目前，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结合所在国家的发展战略、资源禀赋、市

场需求等因素，在沿线 20 个国家建设 56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这 56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既有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农业产业型，也有商贸物流型、科技研发型及综合开发型等，对引导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实现产业集聚发展，对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园区建设进展顺利。

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重大项目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对发挥投资对贸易的带动作用，促进贸易投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综合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专项安排等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项目落地。积极协调各种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用好多双边投资合作基金，加大对项目的支持力度。密切跟踪项目进展情况，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和保障，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困难，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目前，一批重大项目陆续落地，中老铁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已经开工，中俄、中哈、中缅等油气管道项目的建设或运营都在有序推进。

自由贸易区网络正在形成。加快与沿线国家建设自贸区，是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深化经贸合作。目前，我国已经与巴基斯坦、东盟、新加坡、格鲁吉亚签署了自贸协定，与东盟的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已于 2016 年 7 月 1 日生效实施。我们正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以及与以色列、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自贸区谈判，力争打造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我们还积极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稳步推动改善民生的援助项目建设，帮助沿线国家改善民生，使民众直接受益，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秉持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国家加强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营造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环境，深化经贸合作，让“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服务于更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蓬勃发展。

资金融通：协同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保障体系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周强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基础相对较弱，资金和技术缺口巨大。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投融资体系和投融资平台建设。4 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

“丝路基金”投资达 40 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 9 个项目提供 17 亿美元贷款，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 125 亿美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宣布，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达 3000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此次论坛还围绕促进资金融通达成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如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中国财政部与世界银行等 6 家多边开发

机构联合签署了《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紧紧围绕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合作的融资需求，动员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协同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

一是统筹国内和国际资源。要充分运用我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等国内资金资源，共同推动“一带一路”融资机制建设。多年来，我国在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市场化运作的丝路基金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度也在不断提升。它们具有实力较强、影响力大等诸多优势，完全有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展身手。同时，多边开发机构、国外主权财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拥有巨额资金和丰富的知识资源，应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共同打造风险可控、收益可观、利益共享的重点项目，实现国际国内资源相互补充，共同发力。

二是统筹政府和市场力量。要有效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促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及融资安排，营造透明、友好、非歧视的融资环境。对意义重大的战略性项目，政府官方发展援助、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国有企业等公共性质的投资应形成合力，带动私人资本进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不断迈上新台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创新融资模式、渠道、工具与服务，发展和完善股权融资市场和本币债券市场，形成一整套的金融政策组合工具。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建设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实现各方资金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

三是统筹多边和双边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多数项目属于双边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等项目。要高度重视双边融资合作，用好我国与资金使用国两种金融资源、两个金融市场，统筹建设好双边项目。同时，充分发挥多边开发机构较强的召集力，探讨既符合多边开发机构各自宗旨及发展战略，又契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领域，通过联合融资、平行融资、三方合作、多方合作等不同形式，开展“一带一路”相关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四是统筹近期和长期任务。近期应将有限资金集中投向重点地区、重点国家，抓好关键项目、示范性项目，少花钱多办事，集中力量办大事，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远期要全面考虑“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的融资需求，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和完善资金管理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强大、稳定、可持续的融资支持。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和广大沿线国家以及各种国际金融机构的合力推动下，借此次高峰论坛的东风，“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建设必将进入新的阶段，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更强劲动力，为沿线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筑牢社会根基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金鑫 林永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

推进民心相通建设，需要深刻把握民心相通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一方面，民心相通是“一

带一路”五大合作领域之一，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并驾齐驱，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全方位、立体化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相通则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是其他“四通”的重要基础。通过增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塑造积极友好的社会氛围，民心相通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可以说，民心相通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没有民心相通作努力方向，“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体系就不够完善均衡；没有民心相通作基础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也很难行稳致远。

民心相通建设早期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初步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4年来，中国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广泛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规划实施了一大批品牌项目和活动。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为沿线国家培养了大量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图书展等，推动各国展现各自民族特色，感受不同文化风采，增进相互了解认知。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旅游、政党、智库、青年、城市、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交流宽度、增强交流深度。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唱响“融”字主旋律，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38万多名员工中85%是当地员工。企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爱心公益活动，帮助解决当地民众的实际困难，如中国交建集团仅在肯尼亚蒙内铁路建设期间，就为当地居民打了100多口深水井，赢得肯尼亚民众交口称赞。“一带一路”既有政府间的“大”项目，也有民众间的“小”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高峰论坛为新起点，把“一带一路”建成文明共同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宣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高峰论坛就增强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达成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启动《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以及“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目”等。以此次论坛为新起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继续深入开展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让合作更加包容，让合作基础更加坚实，让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受益者。

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各国共同做好民心相通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促进民心相通建设的常态化、机制化。

我们将秉承开放包容原则，加强国际合作，带动更多国家、更多国际组织、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参与到合作中来，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促进包容发展。

我们将把民心相通建设与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合作与民心相通相互支撑的旗舰项目，形成民心相通为经济合作提供民意保障、经济合作又为民心相通提供物质基础的良性互动态势。

我们将深入开展文明间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把“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摘自《求是》2017年第11期）

用合作共赢理念引导“一带一路”建设

刘建飞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倡议，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周边、着眼全球，综合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重大战略构想。经过几年的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是相关国家的共同事业，需要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来推进，为此就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

“一带一路”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构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虽然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却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极端民族主义、冷战思维等仍然不时兴风作浪。全球化大趋势虽然不能逆转，但是却遭遇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泛滥，保护主义抬头，西方大国失去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兴趣和能力，全球治理遭遇新的困难。特别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非极化加速演进，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上升，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活跃，但是人类社会却面临各自为政、秩序失范的风险。国际体系正在转型，国际秩序需要重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已经走近国际大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的重要变量。世界关注中国并对中国寄予更多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世界大势，理性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就是其中最受世人关注的一个。现在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大会于 2016 年 11 月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决议得到 193 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

“一带一路”最初是基于周边外交而提出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积极响应，其涵盖范围已经不限于周边乃至大周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至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地域更为广阔，可以涵盖所有的海洋。如此，“一带一路”牵涉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中明确指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一带一路”虽然是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开放以及为之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却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和平。在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当下，“一带一路”无疑是为推进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

极具创新性的方案。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可以视为“准全球”的地域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人民创造福祉。这既是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新期待的回应，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结出的硕果。

打造丝路命运共同体是相关国家的共同事业

“一带一路”建设是相关国家的共同事业，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如果从中国经济、安全和外交的角度说，“一带一路”是一项战略，那么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对它们也有战略意义。这是共同的事业，也是共同的战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和命运的高度，紧密结合时代特征的全球治理目标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和可行的实施路径。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准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将极大地提升货物、人员、资金、信息等的流通水平，促进区域内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态、社会等领域的交流、互鉴、融合，从而使相关国家更加紧密相连、相互依赖、兴衰与共。

共同体就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体现的是整体性和统一性，尽管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而命运共同体强调是集体内更带长远性、根本性的共性。这种共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各种挑战显得越来越突出。这种命运共同体就如一条在海上航行的大船，顺利到达彼岸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如果在风浪中倾覆，船上所有人都在劫难逃。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丝路命运共同体，需要相关国家同舟共济，携手共进。

打造丝路命运共同体是相关国家的共同事业，这就需要各国对共同命运有全面、深刻的认知。共同命运首先体现在共同利益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在发展以及许多安全问题上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使得它们一方面面临共同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又面临共同的挑战，尤其是共同挑战。同整个世界一样，“一带一路”区域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比如恐怖主义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大公害，而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东地区则是恐怖主义最为严重的地方，打击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需要本地区以及区外国家的共同努力。各国之间的这些共同利益不是局部性、暂时性的，而是关涉各国生存和人民根本福祉的，因此是命运攸关的。随着共同利益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共同体的整体性和命运攸关性，形成了共同价值，并在共同价值基础上产生了承担维护共同利益、使共同体免遭噩运的责任的意愿。

因此可以说，丝路命运共同体就是“一带一路”区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基础上所结成的命运攸关的整体。各国只有充分认识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共同价值，才能对共同命运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进而才能真心诚意地与其他国家携手推进这项共同事业。

以合作共赢理念引导创新合作模式

在主权国家仍然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当今世界，共同事业必须通过相关国家的合作来实现。然而，怎样进行合作？如何实现可持续合作？这是当今国际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谋发展、促和平作为本国的大政方针，并将合作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然而，合作模式不同，其结局也相差甚远。在旧时代，殖民主义、西方列强在发展与和平问题上虽然有合作，但都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它们为了自己的发展，对外奉行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掠夺殖民地，欺压弱小国家，列强相互之间进行恶性竞争。它们也试图通过结盟和集团对抗来谋取对自己有利的和平局面，但是这种排他性的合作往往是以更大范围的对抗为前

提的，所以难以持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也通常是负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国主导建立了许多国际合作机制，其中一些是普通性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西方大国出于其固有的理念，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试图一直掌控主导权，即使是在它们的能力明显不足的时候。这样的合作模式自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这种模式的合作中获取一定的利益，但却时常要付出沉重代价。这种不均衡的合作也是难以持久的。

当今时代所需要的和平是世界持久和平，发展是世界共同发展。这样的和平与发展，需要的是全球范围的深度合作，为此，就需要创新合作的模式。“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

同以往西方主导的合作模式相比，“一带一路”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完全开放的，不存在集团对抗因素；同时，“一带一路”也不寻求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居主导或中心地位，中国虽然是这种创新模式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但是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而不是居高临下式的强加。这样的合作模式如果要顺利建成并可持续，就必须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最终实现共赢。可以说，由“一带一路”所开创的新型合作模式的精髓是共赢，即开展共赢式的合作，通过合作使相关国家都成为赢者。进一步讲，合作共赢就是新型合作模式的经营理念，只有在合作共赢理念的引导下，“一带一路”建设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经营理念。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抑或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需要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有理由预言，在合作共赢理念引导下，中国外交将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国际关系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共赢是一个新理念，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自有国际关系以来，合作就与冲突相伴随，成为国家之间交往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在旧时代，冲突而不是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合作往往成了进行更大范围冲突的手段。有时合作本身就蕴含着冲突的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旧时代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那时国家间关系更多地是体现在争夺领土、资源、财富上。另一方面与合作的质量有关。旧时代的国际合作，双方获益往往是不均衡的，甚至是强势一方的单方面获益，而不是合作双方的共赢，这样的合作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通过合作来实现永久和平、共同发展，就必须在合作中达到共赢。如果世界各国都秉持共赢理念，那么国际合作的水平将会有质的飞跃。

民心相通是合作共赢的关键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是实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共赢的具体途径。“五通”中，设施、贸易、金融都属于物质层面，而政策与民心属于精神层面。如果说物质层面相当于电脑的硬件，那么精神层面就相当于电脑的软件。软硬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没有设施、贸易和金融这“三通”，再好的政策也是画饼，民心相通也会受到重重阻隔；但是没有政策和民心这两通，先进的设施、畅通的贸易、融通的金融不仅不能带来相关国家的合作共赢，反而可能走向反面，联通的设施会变成国家对抗的工具，贸易和金融会成为国家间摩擦、冲突的动因和战场。在政策和民心这两个软件中，政策固然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环节，因为国家间关系主要是靠政策来调节的，但是更为根本的是民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要民相亲，必须心相通。如果民心不通，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地生根，更难以可持续。因一国政府更迭而使两国关系逆转的事例不胜枚举，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政策没有被对象国的人民认可。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民心相通这个根本环节上下功夫。

民心主要由思想和感情构成，其中思想是根本，而思想的核心要素是价值观。要使民心相通，就必须构建共同价值。物质交流固然会促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是带有利益输送性的贸

易、投资、援助等交流会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但是，只是建立在共同物质利益基础上而没有共同价值为基础的相互了解及感情都是不牢固的。在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中，价值共同体是最为关键的。没有共同利益，肯定不会有共同命运。但是仅有共同利益，也不会形成共同命运。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斗斗合合的剧目不断上演。但是有一个规律，就是那些仅仅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合作关系都是短命的，共同利益一旦实现，合作便烟消云散，甚至原来的合作伙伴在新的利益格局下转身便成为竞争对手。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价值，心不相通。对命运共同体来说，如果没有共同价值，各方对共同利益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有理性的判断、认知并形成共识，尤其是对像和平这样的“有之不觉，失之不可”的“隐性”利益，更需要有基于价值观的理性思维。没有对共同利益特别是带根本性、整体性共同利益的认知就难以有对共同命运的认知，实在的而不是虚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也就不可能形成。在现实国际政治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在旁观者看来有巨大共同利益的两个国家却总是处于对抗状态，陷于两败俱伤的陷阱之中。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难以在客观存在着的共同利益面前形成共识，或者是认识到有共同利益但在实现共同利益的途径和方式上南辕北辙。

维护共同利益，打造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形成责任共同体。为此，必须克服那些试图坐享其成，搭便车，甚至为了使本国利益最大化而给国家间合作设置障碍等狭隘观念。构建责任共同体也需要以共同价值为基础。没有共同价值基础上对维护共同利益的责任担当意识，各国很难自觉地承担应负的责任，共同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总而言之，共同价值对认识并形成共同命运起着关键作用。所谓“志同道合”，讲的正是共同价值、理念、理想对人们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志同道合就是心通。所以，不同的行为主体只有在共同价值的指引下才能理性地认知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进而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开展真诚的合作。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遵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人类共同价值，那么各国之间的冲突就会少得多，互利合作的水平就会大大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除了这些国家看到了其中的潜在利益之外，更主要的是提出这个倡议的中国一直秉持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等理念，而这些理念都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也是最为重要的人类共同价值，更是中国始终坚持的重要理念；自由、民主要求国与国在交往时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而合作共赢正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存在着文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宗教冲突，这些因素长期以来制约着相关国家开展合作。但是，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丝路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它们也存在着许多共性，绝大多数国家人民基本上都认同人类共同价值。不同国家出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历史传统、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因素，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及实现模式的理解会有差异，但这不影响这些国家人民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只要各国都本着开放包容的精神，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就可以实现各种文明在相互影响中的融合演进。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地促进相关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演进，“文明冲突”将成为不归的历史故事。

（摘自《学习时报》2017年5月12日）

“一带一路”建设谱写中国对外关系新篇章

高祖贵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 2017 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多边外交活动，是继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2016 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之后，世界再度聚焦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加上之前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多次发表重要演讲，2017 年 1 月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访问联合国第二总部日内瓦万国宫并同样多次发表重要演讲，世界再度见证中国国家领导人为世界演进和人类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行动推力。“一带一路”建设，从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思想理念，到如今各种经贸合作倡议签订、各类交流活动方案出炉、一系列建设项目开工、一批重点工程和标志性成果逐步呈现，再到人文社会交流升温和政治互信加强，这个重大合作倡议和实践正在谱写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从扩大对外开放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启动我国新一轮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进程。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重要指标不断“全球第一化”，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国际体系变革的促进不断加深，对内决策的国际意义和对外决策的国内影响都在显著提升。世界对我国的倚重、对我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知，以及对我国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影响同样在不断扩展。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一带一路”建设，正是站在这样新的历史方位上，基于之前已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沿边开发开放等区域发展战略，再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从全球视野出发，把中国的发展与周边国家乃至更远地区放在一个大系统里面来谋划。“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东西陆海、统筹政府企业社会、统筹经贸人文安全，全面谋划和大力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在使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实现平衡发展、内地同边疆和港澳台实现联动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新一轮的开放和发展。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我国在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不仅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全面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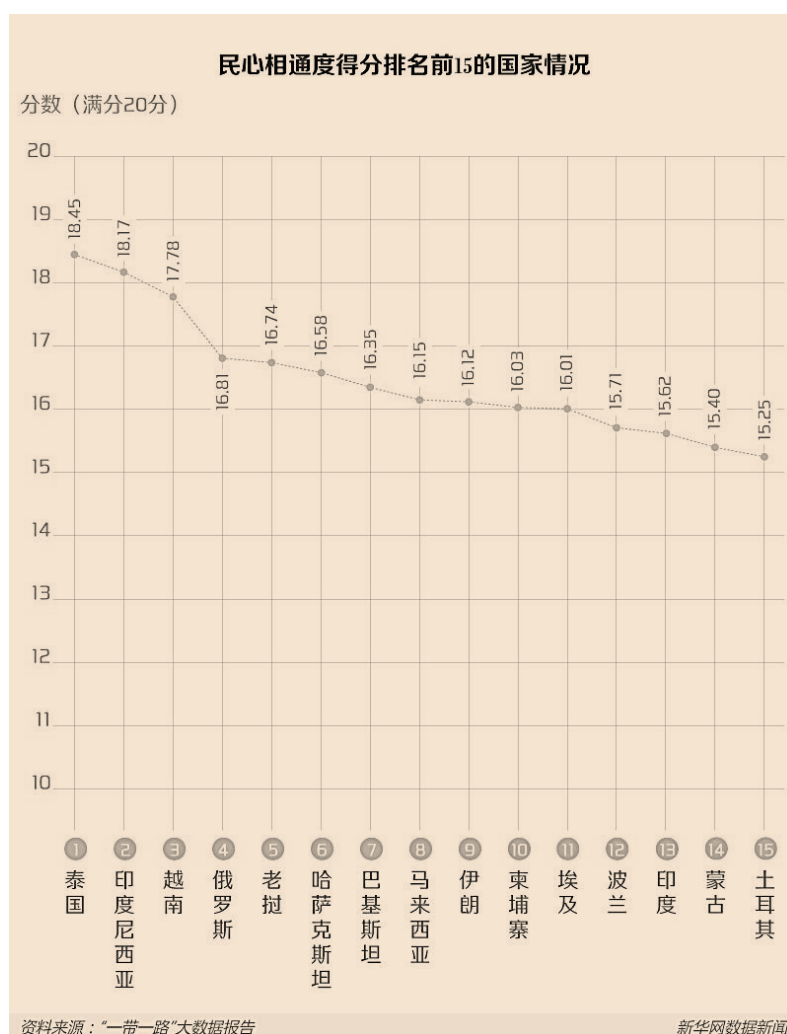
共赢共享提供了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秉持“亲诚惠容”新理念,着力构建周边区域合作新机制新规则、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推进区域安全合作、巩固扩大社会民意基础,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把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作为目标,统筹谋划、平衡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务实合作,使我国在全球和地区大国关系框架中始终处于总体主动有利地位;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创立中拉合作论坛,提升中非和中阿两大论坛合作水平,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实现全球覆盖,切实拓宽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积极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使世界相信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梦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使中国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梦想息息相通。“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创新合作模式,增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沿线国家开始,统筹我国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世界和地区主要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世界各国尤其是沿线国家的积极性,搭乘我国发展快车实现发展目标,使我国与沿线乃至更远国家的经贸联系和人文交流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逐步形成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合作共赢共享的新局面。

从完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提供治理供给的重要平台。随着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深化、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治理赤字明显,治理需求不断增大,提供治理供给更显紧迫。“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唱响“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努力引领地区和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增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诸多合作机制的积极联动;使我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提供助力,为相关地区乃至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使“一带一路”建设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地区热点降温,促进沿线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以此为重要平台,我国在全球层面将继续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按照责任、权利、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促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推动建设和完善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机制规则。

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重要的实践框架。自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首次全面阐述、2015年9月和2017年1月进一步系统深入阐述以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要战略思想已经充分体现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并日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话语。在政治上,我国强调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坚持在不结盟原则前提下广交朋友,倡导建立和积极发展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在安全上,我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安全观,主张通过政治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努力营造公道正义、总体稳定的安全格局。在经济上,我国主张各国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增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在文化上,主张包容互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发展

模式加强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生态上，推动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呼吁和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正是继承和发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把中国的发展强大与世界的进步繁荣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聚焦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开放促合作、以发展促安全、以平等尊重促互信协作。“一带”重在通过中国—中亚—西亚—中东欧—西欧等经济走廊的建设，贯通亚欧大陆；“一路”重在通过缅甸胶漂和实兑港、斯里兰卡科伦坡和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吉布提、希腊比雷埃夫斯等支点的建设，联结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30多个沿线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20多个国家与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随着更多重点地区和重点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乃至更加广阔的地区将进一步结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摘自《学习时报》2017年5月15日）



“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钟飞腾

2017年1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郑重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希望2013年底提出的“一带一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在3月中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首次使用“逆全球化”表述当前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相关的具体经济现象，其实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总结的全球经济三大挑战：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以及发展失衡。那么，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能否成为一种推进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呢？这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认为，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权，反过来说，似乎只有全球霸主才能创造并维持全球化。二战后美国建立的一套国际经济制度是这一论点的历史性证据来源，长期以来美国也不断强调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政府提出与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其主要目标不仅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表明中国无意替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从实力来看，中国目前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这不同于金德尔伯格当初提出霸权稳定论时的历史背景，一战后的美国虽然有实力，但缺乏推动建立开放性世界经济秩序的意愿。那么，霸权稳定论的分析是不是过时了呢？在习近平主席到访达沃斯前夕，约瑟夫·奈构造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说法，重新强调领导力缺失可能导致国际秩序混乱这一问题。奈提醒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既要重视“修昔底德陷阱”，也要认真对待“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说，特朗普政权面临着双重挑战。美国对于长期以来构成其重大国家利益挑战的全球化，目前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美国国内矛盾激发导致其撑不住全球化这个开放性进程，但美国又不愿意放手让中国来改造全球治理。

由此也可以理解美国对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在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时，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于诸如推动基础设施升级、经济合作以及重塑国家间关系的大计划，西方世界最为熟悉的首推“马歇尔计划”，拿它类比“一带一路”也是自然的。对霸权国来说，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角度评估“一带一路”也很自然。尽管中国不断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大合唱，并邀请美日等国参与，但美国政府仍倾向于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中国谋求欧亚霸权的重要举措。横跨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触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均势思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欧亚大陆被一个单一的权力

控制。显然，美国的这种认识与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极为不同，美国并没有将其看作推动全球化的一种新动力。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逻辑，就必须提出新的解释，甚至创造一种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方案的理论。

本文认为，从带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能力来看，中国在全球层面仍落后于美国。但在地区层面，中国已经拥有大致匹敌、甚至高于美国的能力，在制造业规模、发展模式和战略观念上拥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中国的带动力是足够的。本文从发展角度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这对于准确理解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动机、路径与可能性相当关键。因此，当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无力承担全球领导角色，意欲抛弃旧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以英国19世纪的双边模式推进对外经济关系时，中国应该花大力气塑造新型全球化模式，即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新一轮发展。这不仅是拓展开放性经济关系、展现大国担当的需要，也是中国实现国内发展、推进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环境的需要。

一、“一带一路”与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发展

西方诸多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文章将重心放在分析中国的意图上，而忽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这种思维体现了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对崛起国的担忧，它们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国是中国，

中国的倡议将显著改变现状。这种思维对一大批真正需要加以关怀的发展中国家重视不足，西方国家似乎并不认为这些国家有能力挑战其主导地位。因此，西方的“一带一路”研究根本不重视一大批收入水平不高国家的真正需求。在全球化给发达国家造成危害时，这些国家的第一反应是捍卫本国利益，放弃推进全球化。这种角度和视野将极大地误导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认识。

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一带一路”主要是一项沿线国家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按照2015年3月初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是“一带一路”的主旨目标。文件分八个部分、三大板块讲解了这一倡议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倡议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第三部分是“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按照这种思路，也可以说文件的主题是两大块，一是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二是在“一带一路”具体推进时中国方面将涉及哪些领域。

国内外的分析主要从中国这一角度去解读这个倡议。由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决策体制以及地方政府的快速行动，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解读是非常多样化的。根据赵可金的总结，中国学者形成了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第一种将“一带一路”看作外交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在这种视角下，“一带一路”是为了回避美国的霸权压力，巩固中国的区域影响力。第二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国内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向国外转移落后产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三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项国家大战略。这种观点在承认第二种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一带一路”也是一项对外开放战略，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推动建立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在“一带一路”战略之外，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作为中国政府在新时期主推的三大战略之一，“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一学科能够解释的。上述三种观点，基本是国际关系学者、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者的解读，也都是各自学科对区域合作的长期看法。源于学术分工的不同，对“一带一路”的学术解读呈现出多样化色彩。基于“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内容，有的中国经济学者甚至提出“一带一路”是升级版的对外援助。

在国际上，“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对外援助的看法很有吸引力。欧洲人乐于看到中国在这种主张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提供资金建设改善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那么这

个倡议对提高欧洲的贸易收益极为有利。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Bruegel)的一项研究证实,在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贸易成本、通过签订 FTA 降低贸易成本以及两者相结合这三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对欧洲最有利,而沿线国家中的亚洲国家则更能从覆盖“一带一路”的 FTA 中获益。按照这项研究,无论是哪一种方案,日本都是最大的损失者。

目前来看,中国和欧洲是“一带一路”的两头,除了中国和欧洲的视角,“一带一路”还存在很多国别的视角。单纯从国别角度看“一带一路”,还只是基于双边层面的合作考虑。显然,中国政府的目标远高于双边合作。学科与国别的差异是造成国内外看法不同的的重要原因,但缺乏真正的区域性角度也是一大原因。如果换个角度,先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上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的性质、推进路径与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将发展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既体现了中国国内和国际目标的一致性,也为沿线各国理解“一带一路”的共性提供了思路,也只有在这种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牵引下,“一带一路”才能更好地发挥整体效应。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沿线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数据,我们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如表-1所示,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四个收入水平上的人口、工业化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水平呈现出如下特征:

(1)“一带一路”沿线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20个,总人口1.95亿,占全球这一发展水平总人口的16.4%。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8%,略高于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国家。2010-2015年间的经济增速达到3%,显著高于全球同一水平国家。

(2)“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21个,总人口达到5.29亿,占全球这一发展水平总人口的20.4%。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21个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14.7%,显著低于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并不充分。2010-2015年间的经济增速达到3.5%,显著低于全球同一水平国家的5.1%。之所以有这种统计上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本身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但并没有被包括在本文统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因中国GDP中的制造业占比为29.7%,经济增速达到8.3%,如果将中国定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外,归入全球水平,那么显然会降低该组别的水平。

(3)“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19个,总人口24亿,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的82.0%,也可以说,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14.8%,略低于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相 也不够充分。2010-2015年间的经济增速达到5.9%,略高于全球同一水平国家。因此,就这些国家而言,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4)“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2个(尼泊尔与阿富汗),总人口达到6100万,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的9.6%。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占比与经济增速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差无几。

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特征:以中低等收入人口为主体、制造业发展相对不足、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之中。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似乎可以定位为将沿线国家中的24亿中低等收入人口转变为中高等收入人口,即从人均GNI2300美元提升到4126美元,或者略高一点,实现翻一番,达到4600美元。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阶段 (2010—2015)

序号	组别	人均 GNI	人口 (百万)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2010—2015 年 GDP 增速 (%)
1	美国	55980	321	12.3	2.2
2	高收入国家	41925	1187	14.8	1.9
3	“一带一路”高收入国家	27702	195	16.8	3
4	中高等收入国家	8255	2593	21	5.1
5	中国	7930	1371	29.7	8.3
6	“一带一路”中高等收入国家	7123	529	14.7	3.5
7	中低等收入国家	4508	2927	16.4	5.7
8	“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	2309	2399	14.8	5.9
9	低收入国家	2032	638	8.2	5.4
10	“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	670	61	9.2	4.9
11	世界	10548	7346	15	3

注：(1) “一带一路”高收入国家包括：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文莱、以色列、韩国、塞浦路斯、沙特、斯洛文尼亚、巴林、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阿曼、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以及克罗地亚等 20 个国家；“一带一路”中高等收入国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罗马尼亚、黎巴嫩、保加利亚、黑山、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伊拉克、马尔代夫、泰国、塞尔维亚、约旦、马其顿王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等 21 个国家；“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包括：亚美尼亚、蒙古、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埃及、乌克兰、不丹、东帝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柬埔寨等 19 个国家；“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包括：尼泊尔、阿富汗 2 个。以上各类国家一共 62 个。

(2) 美国、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均为 2014 年值，中国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为 2013 年值，其余均为 2015 年值。若干国家数据缺失。

(3) 按世界银行 2017 年公布的数据，2015 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102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26-4035 美元之间为中低等收入国家，4126-12476 美元之间为中高等收入国家，高于 12476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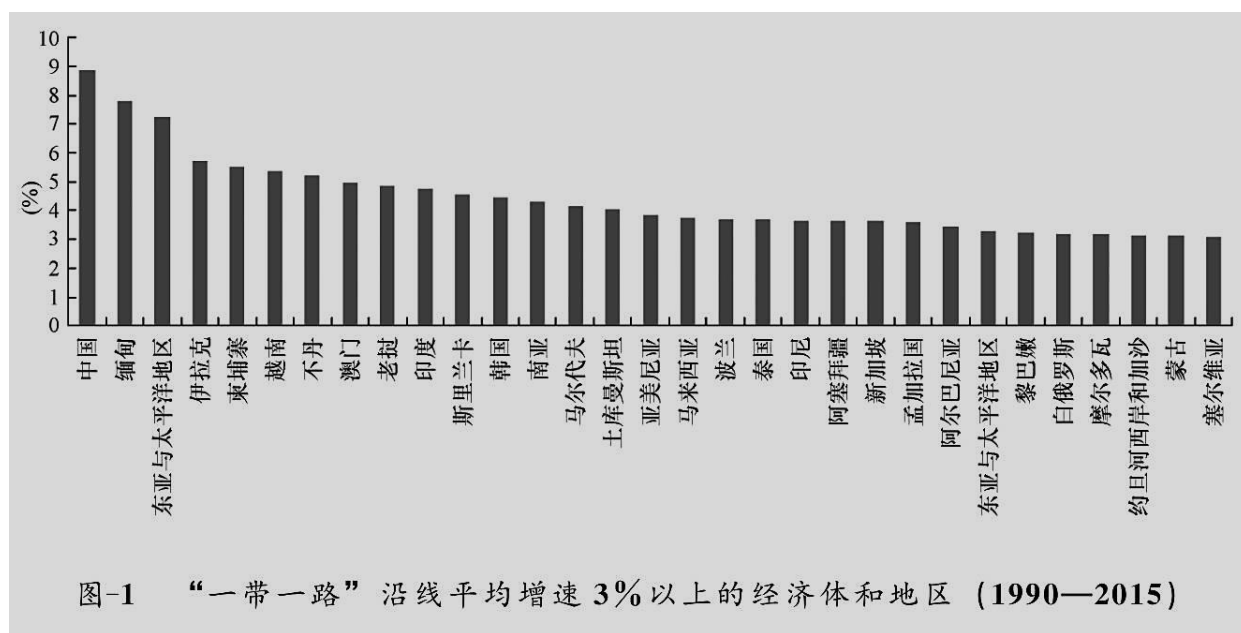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在将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人口转变为中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口方面，过去 30 年中国高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1998 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毕业”，转为中低等收入国家。2010 年，中国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从 1990 年至 2011 年，中国减少贫困人口 4.39 亿，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政策经验对于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世界银行 1989 年首度根据 1987 年的国民收入划分收入国家类型以来，在过去 30 年中迅速从低收入跨越到中高等收入的国家并不多。除了中国之外，只有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南美的圭亚那、中亚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东欧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 5 个国家。阿塞拜疆人口接近 1000 万，其他四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不大。在这

几个高速发展的国家中，赤道几内亚凭借石油开发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除阿塞拜疆之外，另外三个国家收入基本停止增长。由此可见，在摆脱“低收入陷阱”之后，如何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似乎也拥有不错的经验。

按照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总结，工业革命两百年来西方国家的年均增速为2%。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实现赶超，特别是摆脱两个收入陷阱的话，那么在每一个收入阶段，都需要长达25年年均2.9%的增速。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2015年间，全球有43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速超过了3%，其中有28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如图-1所示）。从理论上讲，未来若干年，这些国家均有机会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再进一步。中国以及不包括高收入经济体的东亚太平洋地区，自1990年以来的增速分别达到8.9%和7.2%，属于高速增长型经济体。此外，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南半岛国家和南亚大部分国家，也位于增速前列。

中国以年均10%的增速，花费12年时间，实现了从一个中低等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1998-2010），期间人均GNI从800美元增至4340美元，翻了两番还多。鉴于2010-2015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均增速为5.9%，如果未来以此速度增长，那么从理论上讲人均收入翻一番大概需要12年，也就是说，到2030年左右，“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具备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可能性。



二、对“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发展的新认识

上文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推进的最近一轮全球化只是使少数国家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并没有提高多数人口的收入。尽管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获益者，但西方对以中国为主的发展知识的总结却并不到位，长期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政策。而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的文本来认识发展的。如果西方的总结不到位或者根本产生了误导性的认识，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容易忽视中国的价值以及自身蕴含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回顾最近一轮实现发展的国家的新经验和新看法，考察一下这些新经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有何参考价值。

二战后，有关低收入国家如何实现发展，有过几个大的、阶段性的思潮变化。按照林毅夫的总结，

发展经济学每隔 30 年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思潮变动：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以工业化为目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要体现为依附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主要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断降低政府的作用，转而寻求市场化；目前则进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他本人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在林毅夫看来，其理论主要是以结构转变为核心的一种发展理念。根据这种主张，一国取得发展的关键是，依靠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功能，并且政府在产业升级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事实上，林毅夫的理论总结主要源于东亚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但是，对中国和东亚发展的解读仍然存在多种理论。有的人提出了文化解释，认为东亚传统的儒家文化奠定了重视教育、进而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对实现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蔡昉认为，在传统的马尔萨斯阶段与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之间，还存在一个刘易斯总结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发展所包含的经济结构调整之外，还存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因此，在蔡昉看来，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界目前缺乏一个“将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不容易看清楚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

对于这个难题，清华大学的文一教授将中国当代的发展与 18 世纪后期英国的发展进行比较，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 (Embryonic Development Theory)，试图将原有的发展理论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从农村到城市、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几乎是每个国家，包括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必须经历的进程。而且，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者或阶段论者不同的是，文一认为，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陷阱”。过去几年，特别是世界银行在 2007 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之后，中国政府和学界的讨论已相当深入。但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摆脱“低收入陷阱”并不比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来得更容易。罗伯特·巴罗甚至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神话，因为摆脱“低收入陷阱”也需要几乎同样长时间的较高收入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发展的重新讨论为我们理解“一带一路”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新认识。第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仍然是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证明了发展制造业是推动结构转型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也是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对制造业和结构转型兴趣重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中，印度所倡导的跨越制造业、依靠发展服务业取得高收入的发展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推出的制造业回归也与此认识密切相关。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有着更复杂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依靠制造业。因此，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已成为国际共识，也已逐步影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二，东亚和中国过去依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需要新动力。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潮流兴起，多边主义退潮。由于发达国家短期内难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阶层分化和政治对立将长期存在，这种逆全球化现象不是短期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出口导向战略所依赖的全球贸易大发展时代基本结束。按照 IMF 提供的数据，1984-2011 年间，世界经济和世界货物出口增速分别达到 3% 和 6.4%，这是中国与东亚部分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外部基础。而 2012 年以来，这种外部环境发生巨变，2012-2016 年间，世界经济增速为 2.5%，而贸易增速只有 2.8%。IMF 在世界经济展望中估计，到 2021 年这种外部环境并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因此，这场百年未遇的大危机，特别是发达国家陷入“长期停滞”的危险，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经济结构的可能性。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而言，寻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并推动彼此的国内发展进程，也是不得不实施的政策。习近平在今年 5 月 14 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已经明确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这个创新的大背景是互联网时代，而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将为中小企业的全球化打造新空间，这

显著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巨型公司为驱动力的全球化。

第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对于获得高速增长仍然是重要的。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这种外部环境也可被视为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依附论以核心—边缘关系来描述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美国—拉美经济关系。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需要牢记在心的是，当时拉美国家的人均 GDP 处于美国的 40%—60% 之间，而今天的中国仍然不足美国的 20%，这种收入差距可能是中国吸引的外资还没有大规模外流的重要原因。对到底在哪个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依附论的一些主张来应对可能的后果，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收入阶段，因而基于拉美经验总结的依附论，可能还难以在中国找到经验性证据。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国际主流学术界否定依附论，也跟着轻易否定依附论的见解。事实上，未来一个时期，随着中国与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我们仍然可能面临拉美国家当年遭遇的挑战。当中国被视作欧亚大陆发展的一种带动力量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对待那些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国家这一问题。前几年，在中国大规模进口原材料以及中国企业投资矿产资源时，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中国在外交理念上一直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强调互利共赢，最近几年甚至将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视作外交的重大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说，“一带一路”也带有这种目的，中国试图通过自我约束，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尽可能减少对外部世界的重大冲击。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推进制造业仍然是必须的，但在大危机背景下不能完全复制东亚和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就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基本原则。正因为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可以照搬的既有模式，中国与沿线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和沿线国家一起商量如何寻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尽管有些西方人士认为，协商一致的精神是东亚国际社会的一种特质，能否推行到别的区域还不一定，但基于亚洲的发展成就，务实主义越来越被接受为一种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方式。我们也要看到，20 世纪 50 年代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很多并不是东亚国家，但那次會議达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重大成果。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逐渐发展出“东盟方式”。2015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将其扩展为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帮助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甚至为中国在 2049 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评判标准应该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等收入人口能否取得收入上的极大提高，这一标准其实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推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中国政府基于自身的成功发展经验，很容易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也执行这样一种策略，中国就可以与他们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进程。特别是当中国下一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时，其面临的内外挑战会有较大改变，更需要立足于本地区。

三、中国推动中低等收入国家发展的优势与战略

中国能否带动中低收入人口的发展呢？从收入发展水平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高收入国家。由于理论界并没有关于一个收入不高的国家如何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成型说法，我们需要换一种视角讨论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相当于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提出的半边缘国家，即处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地区。沃勒斯坦强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这个体系中，有少数几个国家进入了核心区，但其他国家也不都如依附论者所说的处于边缘区，而是处于比边缘区更具优势的位置。沃勒斯坦借助“半边缘区”这个概念，帮助理解 20 世纪 70 年代不断获得经济增长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1991 年，沃勒斯坦认为南非正好是其试图概括的半边缘区的代表性国家。按照世行的分类，1991 年的南非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但此后 20 多年来，南非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反过来说，尽管南非处于西方构建的体系当中，但那些收入极高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能力或者意愿帮助

南非提高收入水平。在地理上远离中心区的南非也缺乏物理上的连通性，要接入全球的增长中心——美国、欧洲和东亚，存在极大的困难。沃勒斯坦甚至认为一战前夕的俄国也是半边缘国家，并强调苏联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为止取得了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速，一举成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

因此，带动能力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经济能力，特别是制造业能力，可能也取决于地理的临近性，特别是将经济发动机与落后地区相捆绑的制度框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理上是相互连接的，如果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能够实现收入翻番，那么说明这个制度设计是合适的。从经济能力来看，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中国目前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带动力。由于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按照文一教授的理解，“中国崛起给全球经济力量带来的冲击力是 19 世纪末美利坚合众国上升期时期的 20 倍，19 世纪初大英帝国爆发时期的 100 倍。”仅从人口数量意义上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进入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基本还是五分之一。如果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能够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那么这是比过去两百年西方实现工业化还要伟大的事业，显然将拥有足够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能力。而对于这种超大规模引发的地区发展效应，西方的估计也是不充分的。

在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方面，中国的优势毋庸置疑。为了评估一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其《工业发展报告 2016》中构建了一个竞争性工业业绩（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指数。该指数不是衡量一国的潜力，而是比较已经显示的制造业能力。CIP 指数由生产和出口制造品的能力、技术深化和升级能力、对世界的影响力这三个一级指标构成。在 2013 年度的总排名中，中国列第五位，仅次于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这 5 个国家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 59%。德国的优势在于复杂的工业增加值创造链条，德国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其制造品出口的 73%。日本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制造业基地、高技术出口和较高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工业竞争力也源于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但美国不像日本那样用于出口。中国的劣势和优势同样明显，以人均衡量的制造业贸易额和生产能力比较低，但在全球制造品贸易总额中遥遥领先（17%），而且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2013 年，就制造品贸易的世界占比而言，中国是美国的两倍还多，就对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而言，中国仅次于美国。占世界制造品贸易 1% 以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韩国、印度、俄罗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波兰、捷克和土耳其 9 个国家，合计 18.57%，但这 9 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合计不过 13.64%，大大低于中国的 17.55%。因此，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品贸易，且在制造业增加值上显著超过沿线国家，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战略优势还在于形成了一个高收入的沿海地区。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邓小平的带动思想对于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如表-2 所示 2015 年中国沿海地区（东部）11 个省市的总人口为 5.7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41.4%。从经济总量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达到 40.2 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的 58.6%。而在人均 GDP 方面，除了河北和海南之外，东部沿海地区 9 个省市的人均 GDP 均在 1 万美元以上。11 个省市人均 GDP 为 12110 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以 9 省市计算，则人均 GDP 为 13356 美元，无疑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15 年，11 个省市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 85.2%，吸收外资的存量占全国的 80.8%，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 81.1%。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中拥有巨大的能量。

表-2 作为“一带一路”增长极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2015)

省市	人均 GDP (美元)	GDP (元)	人口 (万)	对外贸易 (亿美元)	吸引外资 (万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北京	17329	23014	2171	3194	3810	38799
天津	17094	16538	1547	1143	1813	10942
上海	16660	25123	2415	4492	6613	58362
江苏	14124	70116	7976	5456	7822	22614
浙江	12462	42886	5539	3468	2918	22365
福建	10909	25980	3839	1688	1967	8203
广东	10835	72813	10849	10225	6443	68655
辽宁	10490	28669	4382	9595	2066	11319
山东	10299	63002	9847	2406	2193	27305
海南	6551	3703	911	140	312	4894
河北	6461	29806	7425	515	736	5725
合计	12110	401651	56901	33687	36693	279184
占全国比重	142.1%	58.6%	41.4%	83.6%	80.8%	81.1%

注：对外直接投资为存量值，且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

拥有近 5 亿人口的东部沿海高收入地区将形成怎样的一种全球性影响呢？做一个简单的历史类比，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力量。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西方社会长期宣扬 19 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与 20 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其实是赞扬英国与美国带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工业化。那么，当年这两个国家在发起工业化和带动其他西方国家时，拥有怎样的能力呢？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820 年时英国总人口为 2124 万，占西欧 12 国的 18.3%。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下，英国才具有带动西欧整个区域的工业化能力。1872 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但直到 1918 年美国人均 GDP 才超过英国，在此期间，美国人口占西方的比重从 15.5% 上升至 24.1%。1951 年，美国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带领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形成了二战后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此时，美国人口占西方人口的 27%，占全球的 6%，人均 GDP 为 10100 国际元。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其背后的支撑性力量是人口和市场的规模。2009 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9.7%，2030 年仍然可以达到 17.4%。在 2009-2030 年间，这个比例也正是当年英国崛起时候相对于西欧的比例（18.3%）。2015 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和人均 GDP 水平则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相当。正是从人口占比和经济规模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带动“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的能力，而 2049 年的中国则具备带动世界发展的能力。

如果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中南半岛、南亚地区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太平洋地区西北部以及印度洋北岸将形成一个连贯的增长极。由于地理相邻，中国要比德国、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制造业强国，具有更强的带动沿线国家发展的能力。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远低于上述四个国家，但就工业发展的带动力，特别是承接产业转移而言，对沿线国家却是一个优势。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人均 GNI 差距过大的两个国家往往难以最有效地进行技术吸收和产业转移。

而提倡现代化理论的罗斯托在冷战结束前夜也这样说：“（趋向技术成熟的国家）在耐心帮助那些渴望进步的落后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更接近发展的初级阶段，从而应该能够提供有效的技术援助。”从跨国的地区间关系来看，向靠近本国的地区增长极靠拢，以此为目标设定发展政策和对外战略，也是一项实用主义的安排，这一点在东亚已经被总结为“雁形”发展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容易实现产业升级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区域，应当是各个发展水平都有的一个区域，即低收入、中低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高收入国家聚集。罗斯托在回顾“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之道时曾指出，“马歇尔计划”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是构建了西欧、美国和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路线。实际上，美国从1949年末开始将“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搬到东亚，设计了美国（核心区）、日本（半边缘区）、东南亚国家（边缘区）之间的三角贸易路线。就此而言，在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以中国—中南半岛为基础构建的澜湄合作机制最富发展前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也有助于推动这一增长极。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有“心心相印”的说法。无独有偶，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马尼拉提出了与东南亚“心心相印”的“福田主义”，强化日本与东南亚的互惠关系。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68.7%，但却是中南半岛国家的15-17倍。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结束。如表-3所示，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国家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现在人均GDP是它们的2-4倍。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当年日本的差距还很大。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3.4%，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如果考虑总人口1.6亿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个省市，那么这种对比关系会有较大变化，这对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推动“一带一路”的能力很有意义。2015年，上述四个省市的人均GDP为16300美元，换算成购买力平价为2.8万美元，是柬埔寨的8倍。

表-3 中日提出与东南亚构建“心心相印”关系时的人均GDP水平

1977 年			2013 年		
	人均 GDP	日本/该国		人均 GDP	中国/该国
日本	12064	100%	中国	12368	100%
美国	17567	68.7%	美国	52750	23.4%
新加坡	7223	1.7	新加坡	80768	15.3%
马来西亚	3076	3.9	马来西亚	24231	51.0%
泰国	2249	5.4	泰国	15435	80.1%
菲律宾	2210	5.5	印度尼西亚	10010	1.2
印度尼西亚	1675	7.2	菲律宾	6587	1.9
老挝	821	14.7	越南	5300	2.3
越南	818	14.7	老挝	4954	2.5
缅甸	—	—	缅甸	4479	2.8
柬埔寨	717	16.8	柬埔寨	3058	4.1
中国	894	13.5	日本	39023	31.7%

资料来源：1977年数据来自安格斯·麦迪森，2013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两者均是购买力平价（PPP）数值。

中国选择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个构想，确实也是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发展速度和地区影响力远远超过菲律宾。菲律宾当年是与泰国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美国在亚洲进行民主改革的“窗口”。但如图-1所示，1990-2015年菲律宾的人均GDP年均增速不足2.2%，而印尼超过3.6%，印尼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东南亚地区，并成为G20成员国。表-3还表明，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相对于中南半岛国家确实是富裕多了。中国政府于2015年末倡议构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并于2016年3月正式启动，该机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区域合作新模式。在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将惠及周边作为一个显著的政策原则，这也是看到十几年来与周边国家关系已经显著分化。国际贸易经济学的研究早就证实，与中国人均收入差不多的国家其实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从中国经济崛起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端，即收入高于中国和收入显著低于中国的国家。因此，面向中低等收入国家设计新的制度，使其从中国崛起中获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意。

四、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与大国关系

如果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为了造福沿线国家，而无关自身发展，这恐怕不是中国政府的出发点，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关系更好的一种理解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彻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在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中国的技术也将越来越先进，从而更有利于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这对美国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政府认识到实力壮大之后会对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影响，而且也坚持认为中国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时仍然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巩固一个独特的周边环境。因而，也可以将“一带一路”看作一项外交战略，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进一步构建发展环境、中国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此而言，可以统筹考虑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三种典型说法——国内发展战略、对外经济战略与国际战略，三者逻辑和时间顺序上可以形成连贯的链条。

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大战略的特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基本上就是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推进的，我们也如期实现了邓小平确立的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在中国于2010年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并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时，以往支撑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环境，能否适应更高阶段的要求呢？对此，国内有争议，有人建议继续韬光养晦，有人认为要奋发有为、改变不利的环境。事实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和平环境往往是外生的。这种和平环境一般不由发展中国家本身提供，往往是由霸权国缔造的国际秩序决定的。美国塑造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表明，参与美国体系的成员需要提供支持，例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均提供美国海外驻军的费用。与此同时，也不否认有相当多的国家是免费搭车者。那么问题就来了，当霸权国无力提供这种安全公共产品，且几个主要大国也不愿意共同承担时，世界会怎样？一个可供借鉴的经典案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谓霸权缺失导致冲突乃至战争，这也是约瑟夫·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缘由。但中国显然已经认识到免费搭车有很大的代价，提出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国政府计划于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某个时间超过美国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中国早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开始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来描述与美国这个霸主的关系，其缘由之一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时，其军事力量仍然远远不及美国。从国际关系理论上看，大国（great power）最核心的含义是军事力量。据西班牙艾尔卡诺（Elcano）皇家研究所构建的全球存在感指数（Global Presence Index），2015年全球主要大国的排序依次是美国（1100）、中国（414）、德国（404）、英国（404）、俄罗斯（320）、法国（317）和日本（248）。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第二、军事第三，但软实力排名

第 5 位，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显然，中国试图提供一种新的关于什么是大国的定义，尽量使军事力量的发展与经济利益的扩展相匹配，而当前美国军事力量占全球比重远远超过其经济力量的占比。

中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进程。作为一个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并获得政治独立的大国，中国在二战后的一批新国家中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显著内涵之一是，中国曾用革命性的方式谋求改善国际秩序，并且理所应当认为中国应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有三次比较显著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第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标志性成果是万隆会议，团结的对象主要是处于边缘区的亚非新独立国家。第二次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合作对象是依然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区的拉美国家，标志性事件是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第三次则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此时，中国已经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支持者。尽管中方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兴趣只停留在中方提出的不对抗、不冲突这一点上。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中国能否推行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忧虑变得更加突出。2017 年 4 月 8 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提出，中国欢迎美方参加“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5 月 14 日，特朗普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率队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对此，美国右派网站 Breitbart 刊登的一则评论将特朗普此举称之为“最富尼克松式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曾在国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提出与美苏构建新型国家关系，但进展不大。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似乎也说明，一国的对外战略也要符合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的需求。

西方社会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担忧，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之日，欧亚大陆将被一个单一的权力控制，将严重冲击美国的国家安全。鉴于“一带一路”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很难获得直接证据来证实或否定上述推测。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三次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程来看，中国对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阶段，是自身作为一个边缘区国家与苏联结成盟国之时。到了第二个阶段与半边缘区构建新型关系时，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持续时间很短。目前处于第三个阶段，即试图与核心区国家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一致。这些关键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机制，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变得比以前更为富裕。

“一带一路”并非是绕开核心区国家，在边缘地带发起冲击。证据之一是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的国家分布全球，特别是很多成员国是位于核心区的欧洲发达国家。AIIB 的成功也表明，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可以创造一些机制，与富裕国家搞好关系的。就此而言，中国获取大国地位的路径，不同于历史上的德国与日本，当年这两个国家都在本国附属地带构建排他性的“泛区”，且通过武力强行实现“泛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人口多达 24 亿的低中等收入国家，分布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不仅政治上难以统一，经济上短期内也很难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体化区域。即便到 2030 年左右，这个地带的人口从低中等收入转变为中高等收入，也不可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该区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表明，中国很难控制或者主导这个广阔的地带，更不用说将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向核心区发起冲击。因此，美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中国在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后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冲击力，特别是中国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秉持共商、共建与共享原则，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主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大规模的技术吸收阶段，只有部分国家开始向大众消费阶段迈进，在产业序列上根本不构成对发达国家前沿产业的伤害。中国国内大规模推进产业创新，特别是制造业 4.0 版，用意之一是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升级提供帮助。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处于前沿地带，但国内很多地区甚至存在完成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繁重任务。几种工业革命阶段并存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

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指出：“在世界上部分地区，以前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全球仍有13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也就是说，仍有17%的人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40亿人，仍无法接入互联网，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中国的产能是可以利用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无法与中国所吸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相竞争，西方国家的全球制造业贸易占比远远低于中国。当然，就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只有通过若干个国家的合作，即某种新型的地区合作才能实现中国的产业转移，这种新型的地区合作可以是“经济走廊”，也可以是中国境外加工园区等，都需要与沿线国家通过“干中学”加以推进。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创造和维护地区合作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能力和政治氛围。由于需要创建多个层次的地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本身蕴含着共同发展的新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产业跨国转移引发的政治动荡。对中国来说，提升这些国家的工业能力，在经济上是扩大市场，但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迫使这些国家注重政治稳定和增加安全投入，改善这些地区的安全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日渐增长的海外利益。

如果各国真能响应中国的倡议，围绕“一带一路”实施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则有可能推动全球转型和地区转型。“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等收入国家将取得极为明显的收益，即转变为中高等收入国家。这是一个几乎两倍于中国人口规模的大市场，完全可以抵消过去产业转移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历史，实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两百年来所没能实现的目标，帮助欧亚大陆从第二次工业革命飞跃到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从思想理论上说，则再度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国家治理能力对市场经济建设至关重要。这至少可以纠正发展中世界盲目追随最先进经济体模式的误区，今后发展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中心将是最合适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组队，而不是最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今后一个时期将回归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即十分重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因此，中国投入巨大的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稳定周边环境和创造中国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和“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为中国进一步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夯实基础。将“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联系在一起考虑，也有助于从战略上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五、结 论

“一带一路”是沿线各国共同参与的发展蓝图，而不是中方单方面实施的援助。辨识各种有关“一带一路”说法的基本前提是摸清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充分重视沿线国家的需求，而不只是关注中国的出发点和目的。本文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视角来理解“一带一路”沿线的整体区域特性。从人均GDP角度来看，全球80%以上的中低等收入人口在“一带一路”沿线。而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制造业能力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对处于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提高收入水平是至关重要的。鉴于2010-2015年间“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的GDP增速为5.9%以及中国花了12年时间转变为中高等收入国家这两个事实，可以将“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设定为，未来12-15年将沿线国家中的24亿处于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转变为中高等收入人口，即人均GDP翻一番，增长到4600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实现人均GDP翻一番或者翻两番方面拥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良好记录。能够取得这种成就，与中国推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以及充分重

视维护与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关。在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上述有利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商讨新的发展战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层次的互联互通，进行产业转移和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一言以蔽之，推动适应地区需求的经济合作与基于地区背景的全球化。更进一步而言，当中国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时，其沿海地区已成为一个拥有 5.7 亿人口的高收入地区。就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和人均 GDP 而言，2015 年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于 1965 年的美国，但东部沿海 11 省市的 GDP 总量是当时美国的 2 倍多。如果考虑到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贸易能力，加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那么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确具有带动“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能力。

如果“一带一路”沿线 24 亿中低等收入人口能在未来 15 年实现人均 GDP 翻一番，那么也将为中国真正地转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推动力同样是重大的。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显著提高沿线国家收入，使沿线国家自愿增加安全投入，维护地区稳定，因此也会减轻对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冲击。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发展前景，势必影响到霸权国对中国政策意图的判断。中国对于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防止与美国发生冲突，并试图使美国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尽管美国方面反应比较冷淡，但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绝对多数人口迈向中高等收入，这一情形会发生较大改变。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认识到，那些人均收入在四五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提出的发展政策很难直接用来提高本国的发展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中低等收入国家会更频繁地寻求与中国讨论发展方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全有能力塑造基于地区背景的新型全球化。而一个变得更加富裕的“一带一路”，也将充分提高美国解决其国内政治经济难题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美在建设“一带一路”上拥有长远的共同利益。

（摘自《外交评论》2017 年第 3 期）



“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应对

傅梦孜 徐刚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迄今已三年有余。这一倡议理念创新、目标明确、布局宏大、措施有力、进展可喜，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最富实质内容、最具明确路径的对外开放经济战略规划，将有力塑造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地缘经济路径，打造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动、互赢的新方式，也将成为中国夯实全球经济大国地位、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一、建设进展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由理念到框架，由框架到战略规划，由战略规划到深入实施的逐层和高效引导的演进过程。

（一）顶层设计逐步完善。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引发广泛国际关注，成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最明确的初始标志。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并列为国家三大战略。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就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等方面予以明确说明，标志着“一带一路”总体顶层设计出台。201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将“一带一路”列入“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双重重任。

根据顶层设计规划，“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着力推动“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沿着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轨迹，丝绸之路经济带依托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

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意在重点畅通三大方向：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以重要港口为节点，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一路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一路则到南太平洋。

（二）相应支撑措施和保障体系陆续建立。首先，“一带一路”国内统筹协调机制基本建立起来。2014 年 4 月，商务部设立欧亚司，主要负责“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 12 国的经贸关系工作。2015 年 2 月，中央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西部开发司牵头协调，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共同推动，下设综合组、丝绸之路组、海上丝绸之路组和对外合作组。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和杨洁篪担任副组长，高规格配置凸显中央高度重视。《愿景与行动》提出后，各部委、省份的具体推进措施不断出台。国务院层面出台了包括交通、贸易、能源、旅游等一系列对接“一带一路”的文件。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也相继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等文件。截至目前，几乎所有省份和节点城市都已出台“一带一路”对接方案。2017 年 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外交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林业局、银监会、能源局、外汇局以及全国工商联、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13 个部门和单位，共同设立“一带一路”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机制，旨在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 PPP 模式，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落地。

其次，金融保障不断增强。2014 年 12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丝路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丝路基金首期注册资本 100 亿美元，专门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经贸合作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截至 2016 年底，丝路基金重点追踪项目已有 100 多个，实际投资额约 40 亿美元。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沿线国家累计支持项目逾 600 个，贷款余额超 1100 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项目 603 个，贷款余额同比增加 13%。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优势显现，中国工商银行是目前沿线国家覆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已在 18 个国家建立 123 家分支机构，截至 2016 年中累计承贷 220 亿美元。2016 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承保沿线国家项目 303 个，承保金额高达 1133 亿美元。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资本规模高达 1000 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顺利完成筹建工作，自 2016 年进入运营阶段。2017 年 3 月，亚投行实现首次扩容，新增包括阿富汗、中国香港、加拿大、比利时在内的 13 名成员，成员数量增至 7 个，超越亚洲开发银行成员规模，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自启动以来，亚投行累计发放 17.3 亿美元贷款，支持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阿塞拜疆和阿曼等 7 个国家的 9 个基础设施项目，其中 6 个项目是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联合投资。这为新成立的亚投行开创了与国际开发机构联合融资的新模式。

另外，在“一带一路”实践层面已有重大进展情况下，中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软实力建设，如进行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加强国际传播、舆论引导等。2016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2017

年5月中旬,由中国发起并主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继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外交主场,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关键时间节点和重要沟通平台。

(三) 国际认同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正建立起一个和平、开放、包容、相对松散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中国的“朋友圈”

正不断扩大,已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并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形成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一带一路”已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沙特“2030愿景”、欧洲“容克投资计划”、越南“两廊一圈”、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等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形成对接,不少国家更将“一带一路”视为重大发展战略机遇。此外,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有关文件也相继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除与沿线国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外,中国还与法国、德国、韩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就共同开拓沿线第三方市场达成重要共识,拓展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开展合作的新模式,也推升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合作技术层级。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均设立“一带一路”专门机构,以管理协调相关事宜,如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对华事务委员会设立“一带一路”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设立“一带一路”专网,上海进出口商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贸促会、土耳其—中国工商业协会、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等近百家中外商会、企业发起设立“一带一路”贸易商联盟,联合国亦设立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

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S/2274号决议。4月起,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先后以多种形式认可并促进“一带一路”的开展与实施。同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第A/71/9号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并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

(四) 重大项目取得早期成果。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比如中巴经济走廊推进顺利,早期收获项目初见成效,瓜达尔港口2016年11月正式通航,可泊5万吨油轮。一些项目有望进一步顺利推进,如吉布提港口2017年完成首期工程,雅(加达)万(隆)高铁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马(马亚西亚)新(加坡)高铁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塞尔维亚段启动,“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等。再如中缅输油管道正式投运,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已通气投产,中俄预计将于2017年底前就建设莫斯科—喀山干线达成协议。目前,中欧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作,发展至39条运行线,联通16座国内城市和12座境外城市,2016年中欧班列共开行1702列,同比增长109%。2017年2月,多个城市还提出“运力翻倍”计划,预计到2020年中欧班列将达到年5000列左右。

二、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延伸范围广阔,建设周期长,投入资源巨大,任务异常繁重。经过多方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开局良好,进展可喜。但应注意的是,除一般风险评估构成要素之外,这项几乎在全球展开的宏大系统工程还伴随着难以回

避的特有挑战。

（一）全球化退潮威胁严峻。2016年以来，全球政经领域“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欧洲右翼势力影响上升等一系列事件表明西方政治生态正发生急剧转变，“对精英、主流政治和现成建制深怀疑虑和敌意的民粹主义”迅速势力大增，经济领域的逆全球化思潮愈益泛滥。美国一度是冷战后全球化的引领者，获得巨大红利，但现如今引领意愿与能力不再。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及“购美国货、雇美国人”，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造成美欧国家以上表现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一是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发展失衡，导致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就业状况不佳；二是对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诉求不一；三是对“规则”益加看重，认为一些新兴国家因行走于“规则”边缘而获益；四是担心新兴经济体国有或公营企业过于强大压垮西方私营企业；此外，贫富差距扩大、难民问题等亦为刺激因素。

（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环境不佳，融资难，运营难。2009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在延宕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国际金融风险并未彻底消除，特别是国际资金市场流动性开始趋紧。历史数据显示，1954年1月—1981年1月美国有效基金利率（EFR）从0.8%上升到20%，1981年12月—2015年1月从12%下降到0.11%，此后至2017年4月略有回升，但未曾超出1%，美元利率可能已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国际融资成本因此上升。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加剧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与资金外流。“一带一路”建设中一系列项目面临巨额融资需求，资金融通可能面临困难。

（三）大国竞争与博弈加剧阻滞“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层面，霸权国家猜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侵蚀并取代其主导地位，战略阻挠难以避免。地区层面，地区性大国对“一带一路”也存在挥之不去的疑虑，如印度激烈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对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态度消极；日本对亚投行的抵触以及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等。一些次区域大国也可能因担心“一带一路”将引发中国影响力大增，而对合作的态度不积极，甚至干涉有关项目推进。

（四）沿线国家内部政治纷争和民间负面舆论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不少沿线国家政治环境不佳，执政者更关心的是在其任内很快显现政绩（这不利于“一带一路”某些长期项目的推进），而“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对有关建设项目也可能故意予以阻挠。同时，某些对华不友好的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团体常以环保问题、拆迁问题、腐败问题等制造负面舆论，导致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能立场摇摆，如欧盟对匈塞铁路的阻挠便缘于舆论对中国国企过大影响的担忧。

（五）非传统安全挑战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民族宗教多种多样，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如恐怖主义泛滥、地区冲突不断、流行性疾病爆发等都可能给“一带一路”的推进带来突发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应对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由提出到实施毕竟只有三年多，与取得的进展相伴随，面临一些挑战也在所难免。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不断创新理念，加强形象与话语构建，也需要对具体问题予以具体应对。

第一，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轮全球化。在全球化退潮的阴影下，国际社会期待中国采取有力举措继续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欧洲甚至提出中欧共同引领世界经济。中国应秉承积极进取立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理念创新，

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具有中国元素、彰显中国智慧的新一轮全球化，吸引世界各国广泛参与。

第二，把握推进节奏，注重长远。中国应更加注意“一带一路”推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从长远角度展开建设，求一事之大成而不求一时之小利。中国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韧性，在全球环境复杂与经济困难时期调整好节奏，谋求“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推展。

第三，预防“一带一路”的推进被一些国家的舆论炒作或政治纷争所绑架。中国要做到既不有求必应，也不强推项目。对与一些国家现政府谈成的项目，要注意其未来政策变更的可能性，对其下任或反对党政府上台政策变更牵涉到的项目要有对策备案。一般而言，选举政治有周期性，执政党要取得政绩也有很强的周期性，有关项目在一定阶段没有取得显著成果，其进一步推进便可能会受到影响。时下民粹主义盛行，很多政治人物，包括对华友好的人士，都可能会被一时舆论“民意”所左右而改变态度。因此，“一带一路”推进中要注意阶段性项目与长期性项目的配置，更要明确重点布局，避免四面开花，尊重市场规律。

第四，处理好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加强合作，避免对抗，互利共赢。美国担心中国会借“一带一路”另起炉灶，如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对“一带一路”态度负面，认为其旨在对抗“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中国向西拓展战略空间的举措，是为了重塑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推行“去美国化”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近来，美国学界对“一带一路”评价有一些积极变化，有专家认为，如不参与其中，美国企业将蒙受很大损失，成为21世纪地球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局外人。中美合作对双方皆有利，美国在技术、运营、金融、法律、风险管理等领域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学习。中美在非洲清洁能源领域已有合作，下一步十分重要的是，寻找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共识与工作路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表示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这展示了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对美国进一步开放的态度。

第五，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评估、监督与应对。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安全风险将愈益凸显。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海外利益正不断扩大，保护海外利益对中国来说日益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依据战略性项目、政策性项目 and 商业性项目分头推进，注意跟踪项目所在国动态，及时评估进展与风险，以利长期推进。海外安保涉及面广，统合难度大，宜组建高级别机制进行统筹领导。

第六，讲好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建设多涉及基建项目和产能合作，存在复杂的环保评估、拆迁等问题，容易被国际和所在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借机炒作。对此，项目评估时可考虑广泛吸收国际性或地区多边组织甚至民间团体等第三方参与。同时，加强公关宣传，通过画报、视频、网络、微电影、展览馆等形式公开报道一系列具有良好经济和社会溢出效应的民生项目，争取所在国民众理解和认同。

第七，可考虑推动“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共创新型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合作平台。中国可与沿线国家探索商建定期或不定期的首脑会晤机制，并设立专项事务的部长级会议、一轨半或二轨论坛以加强沟通，就“一带一路”推进中面临的问题共商对策。

（摘自《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进展、 成果和前景

骆永昆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沟通、互联互通、经贸合作、资金融通以及人文交流。然而，自2013年以来，由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临一定困难。在过去三年多时间中，“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究竟有无进展？南海问题是否阻碍“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落实？本文试梳理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进展、成果，并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南亚

依据中方发布的愿景与行动规划，“一带一路”倡议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地理范围上看，“一带一路”涉及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陆地方向，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三条线路：自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海洋方面，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涉及两条线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其二，从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看，“一带一路”倡议贯穿欧亚大陆，并途经南海、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60余个国家，具体来说包括东亚12国，即蒙古国及东南亚11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东帝汶），西亚18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独联体7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以及中东欧16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和马其顿)。

其三,从合作的内容看,“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五大合作内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政策沟通,即加强政府间合作,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设施联通,即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3)贸易畅通,即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强合作“蛋糕”。重点是建设经贸产业园区,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国巴基斯坦及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4)资金融通,即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5)民心相通,即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其四,从合作的原则看,“一带一路”倡议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与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就中国与东南亚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意义。首先,东南亚国家既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涉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战略区。东南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三支线的首站,而南海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战略区。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国家。发展与上述五国的关系对于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至关重要。

其次,东南亚是推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合作的重点地区。从目前的规划看,“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六大经济走廊,有两个涉及东南亚国家,即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孟中印缅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上两大走廊囊括了中南半岛五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也是促进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沟通、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这决定了中南半岛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突出重要位置;发展与深化同中南半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从合作机制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现有的诸多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如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LMC)、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

等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机制与平台，同时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合作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重要渠道。

最后，从合作的原则和理念看，“一带一路”倡议坚持的共商、共议原则，以及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理念，与东南亚国家所秉持的殊途同归、多元包容、均衡发展的发展理念、文化哲学和战略观念有诸多契合之处。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发展理念、文化哲学和战略观念的交流和沟通，这也是深化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伙伴关系的必由之路。

二、“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进展和成就

自2013年10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了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取得了诸多务实成果，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第一，政策沟通。2013年10月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保持了高频率的互访与会晤，这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较为罕见。双方领导人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了政治互信，对共建“一带一路”达成了战略共识。相关重要访问和会晤有：2014年11月，印尼总统佐科访华，出席北京APEC会议，这是佐科担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同时到访中国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还有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文莱苏丹博尔基亚。12月，泰国总理巴育访华。2015年3月，佐科正式访华，同时访华出席博鳌论坛的东盟领导人还有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塔纳萨；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与佐科总统、柬埔寨首相洪森会晤；10月，洪森访华；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越南；李克强总理访问马来西亚。2016年8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访华；9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华；9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老挝；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访华；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2017年1月，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2017年5月，东南亚七国领导人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佐科表示，印尼希望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双方要以海上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重点，带动两国整体合作。纳吉布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将为马中两国带来巨大商机，两国应抓住机遇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文莱苏丹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东盟及APEC峰会所提倡的互联互通倡议相一致，必将进一步完善两国双边合作机制，增强双方经济联系和人民之间交流沟通。洪森表示，柬中两国在各领域保持着良好沟通，柬方希望在社会发展领域继续同中方开展互利合作，希望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加强柬埔寨水路、航空等交通领域互联互通建设，在卫生、农业、应急救援等领域拓展合作。泰国总理巴育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称泰方愿意积极参与中方关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深化铁路、通信、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朝着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迈进。老挝副总理认为，“一带一路”有助于把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在此框架下，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将更加高效，本地区将更为文明富强。其中，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签署了《关于编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与印尼建立了高层经济对话机制，迄今已召开两次会议。

第二，设施联通。2013年10月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对主要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展开投资，2016年9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目前，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同

比下降2%，占同期总额的8.5%，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同比增长9.7%。

目前，正在东南亚开展的主要大型基建项目有：（1）雅加达—万隆高铁（雅万高铁）建设项目。雅万高铁一期工程全长142公里，项目投资额51.35亿美元，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三年建成通车。届时，雅加达到万隆的车程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2016年3月16日，印尼交通部与中国印尼合资公司签署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印尼高铁合资公司获得的雅万高铁特许经营权将从2019年5月31日开始，为期50年。2016年3月24日，由中国印尼企业联合体承建的雅万高铁项目5公里先导段实现全面开工。2016年8月，雅万高铁正式获得全线建设许可证。目前，雅万高铁的建设正在按预定计划推进。2017年4月，由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企业合作建设的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总承包合同在雅加达签署，雅万高铁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2）中国老挝铁路项目（中老铁路）。中老铁路北起中国老挝边境的磨憨/磨丁，南至老挝首都万象，途经老挝孟塞、琅勃拉邦、万荣等主要城市，全长418公里，其中60%以上为桥梁和隧道。建设标准为国铁Ⅰ级、单线设计、电力牵引、客货混运，时速160公里。中老铁路总投资374亿元人民币，建设期五年。中老双方按70%:30%的股比合资进行建设。2015年11月，中老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铁路基础设施合作开发和中老铁路项目的协定》，标志中老铁路项目落地。2015年12月，中老铁路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奠基仪式。但由于资金、环境、沿线开发、偿还方式等多种因素，中老铁路一直未能如期建设。2016年9月，李克强在访问老挝时与老挝政府总理通伦·西苏发布联合公报，落实中老铁路项目问题。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在老挝琅勃拉邦举行，预计铁路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

（3）中国泰国铁路项目（中泰铁路）。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全长近900公里，分为曼谷—坎桂—呵叻段、玛塔卜—罗勇段和呵叻—廊开段，共经过泰国10个府，在泰国东北部的廊开与已经奠基开工的中老铁路对接，经老挝磨丁和中国磨憨抵达昆明，此线路为泛亚铁路的中线。2016年12月，依据中泰两国最新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泰铁路曼谷—呵叻段计划于2017年初开工建设、大约三年内完工，而曼谷—廊开线将在未来五年内实施建设。曼谷—呵叻段项目的投资及运营均由泰方承担，同时采购中方机车及材料物资，使用中方技术。采购资金将会考虑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外国贷款。曼谷—廊开线路将主要用于客运。

（4）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由天然气管道和原油管道组成，天然气管道起点为缅甸皎漂，原油油管起于缅甸西海湾马德岛，从中国西南边陲瑞丽入境，接入保山后，借由澜沧江跨越工程连接大理，继而经由楚雄进入昆明。2010年6月，中石油与缅甸国家油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明确中国将在缅甸境内建设并经营天然气与原油两条管道，经营期30年。中缅天然气管道干线全长2520公里，缅甸段793公里，国内段1727公里；原油管道全长771公里。天然气管道设计输量120亿立方米/年，原油管道缅甸段设计输量2200万吨/年。缅甸每年可下载天然气总输量的20%以及载200万吨原油。2013年10月，中缅油气管道的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2015年4月，中缅天然气管道在缅甸配套建设的皎漂、仁安羌、曼德勒、当达等四个天然气分输站全部投用。但是，中缅原油管道的建设进展却稍显波折，2014年5月30日中缅原油管道全线机械完工，具备投产条件，预计将在2017年正

式投产。

(5)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中新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2015年11月,两国在新加坡签署框架协议,确定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主题为“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以金融服务、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为重点合作领域。2016年1月,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委员会成立,首批12个总金额6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第三,贸易畅通、投资合作。经贸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主要支柱。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2016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保持在4400亿—4800亿美元之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截至2015年底,中国与东盟累计相互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全面增强,各类合作项目深入开展。目前,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型合作项目和机制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双边层面。马来西亚:两国双园项目取得新进展,重大合作项目落地。两国双园,即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是中马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合作的示范项目。2016年9月,协鑫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中马科技园、中马第一小学三个重点项目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举行开工仪式,项目总投资达3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9月底,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确定及计划入园的产业项目达6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285亿元人民币。2017年1月,马中关丹产业园在吉隆坡开设办公室,旨在为各方提供更多经商和投资信息。2016年,马中关丹产业园共吸引投资56亿林吉特,这使得产业园累计获得投资(包括实际投资和承诺投资)达190亿林吉特,将为当地提供2.4万个就业岗位。除两国双园外,还有四个重要项目在马来西亚落地,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中广核东南亚公司作为其东南亚区域总部,近期重点推进马六甲燃气项目,该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至240万千瓦。中国中车旗下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的东盟制造中心正式投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亚太区域总部。与此同时,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投资800亿林吉特建设马六甲海峡最大港口皇京港。皇京港深水补给码头是一个液体专用码头,预计在2019年竣工。

缅甸:皎漂工业园与深水港项目。皎漂经济特区位于缅甸西部的若开邦,濒临孟加拉湾,居于连接非洲、欧洲和印度的干线上,是缅甸政府规划兴建的三个经济特区之一。2015年12月30日,中信企业联合体中标皎漂经济特区工业园和深水港项目。工业园项目占地1000公顷,计划分三期建设,2016年2月动工。深水港项目包含马德岛和延白岛2个港区,共10个泊位,计划分四期建设,工期20年。

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2015年11月,中国电建集团投资建设的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是中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又一个重大合作项目。该项目分七个梯级电站进行开发,总装机容量达127.2万千瓦,年均发电量50亿千瓦时,总投资约28亿美元。根据规划,一期先开发二级、五级和六级电站,其余电站作为二期开发。2015年,一期电站计划全部建成投产。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国首批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总体规划面积11.13平方公里,首期开发面积5.28平方公里,以纺织服装、五金机械、轻工家电等为主导产业,同时集出口加工区、商贸区、生活区于一体。目前,特区已吸引包括工业、服务行业在内的102家企业入驻,其中84家已生产经营,区内从业人数1.6万人。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点合作项目。截至2014年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8个国家共投资项目20个;“一带一路”范围内共20个国家在园区有投资,总额149.8亿美元,占园区外资企业投资总额的15.7%。其中,洛文

尼亚有7家企业落户园区，波兰有5家企业入驻园区，捷克有3家企业在园区，斯洛伐克有1家企业在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绿色发展示范区。目前，生态城8平方公里的南部片区基本建成，年生产总值135亿元，累计吸引固定资产投资1000多亿元，引进企业3400余家，注册资金近1400亿元，吸引就业及居住近5万人。正式奠基的国际生态旅游岛投资28.6亿元人民币，拟创造出高品质的清静湖生态休闲度假区，预计2018年5月1日开业。

二是次区域层面。加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合作，打造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2013年10月15日，中国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与老挝中央特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中国磨憨—老挝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框架协议》。2014年6月6日，中老两国签署《关于建设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正式纳入中老国家项目。2016年11月28—12月1日老挝政府总理通伦·西苏访华，中老签署《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共同发展总体规划(纲要)》。该经济合作区占地21.23平方公里。2016年7月，连接中国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的货运专用通道开工建设。货运通道分为中国段和老挝段，其中，中国段长800米，老挝段长1654.461米，总投资近5000万元，预计工期4个月。老挝段先启动建设489.52米，总投资为1300万元人民币。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澜湄合作）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平台。2016年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举行，会议发表《三亚宣言》，确定每两年举行一次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澜湄合作包含三大合作支柱，即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交流。会议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确定拓展工程、建材、支撑产业、机械设备、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产能合作，构建次区域综合产业链，共同应对经济挑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澜湄合作重视打造六国智库联盟和媒体论坛，继续举办澜沧江—湄公河青年友好交流项目。中方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优惠性质贷款和专项贷款，用于推进澜湄合作。

三是区域层面。2015年11月22日，中国和东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简称《议定书》），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完成谈判。《议定书》是中国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通过升级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促进双边货物贸易发展，体现了双方深化和拓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和现实需求。《议定书》进一步明确了原产地规则问题，双方同意对46个章节的绝大部分工业品同时适用“4位税目改变”和“区域价值百分比40%”标准，涉及3000多种产品，包括矿物、化工、木材纸制品、贱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等产品，其中有许多都是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这两种原产地标准，企业可自行选择适用，这将大大便利有关企业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政策。据中方的统计，2016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到4522.1亿美元。截至2016年5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600亿美元，东盟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企业投资主要涉及贸易、物流、建筑、能源、制造业和商业服务等领域。

第四，资金融通。目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57个国家共同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融资平台之一。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东盟10国均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印尼还一度争取在雅加达设立亚投行总部。亚投行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6月，亚投行批准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包括：孟加拉国电力输配系统升级扩建项目（贷款额度1.6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国家贫民窟改造升级项目（贷款额度2.16亿美元，与世

行联合融资；巴基斯坦国家高速公路 M-4 的 Shorkot-Khanewal 路段（贷款额度 1 亿美元，与亚行、英国国际开发部联合融资）；杜尚别—乌兹别克斯坦边界道路塔吉克斯坦境内路段改善项目（贷款额度 2750 万美元，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2016 年全年，亚投行为 7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9 个项目提供了 17.3 亿美元贷款，2017 年预计增加到 25 亿美元。未来 5—6 年，贷款规模有望增加到 100 亿美元。除亚投行外，“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平台还包括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50 亿美元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主要投资农业开发、物流、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等领域。对中国和东盟而言，还有 3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100 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及上文提到的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优惠性质贷款和专项贷款。

第五，民心相通。自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合作项目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支柱。2013 年 10 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进一步深入发展，其代表性的项目有二：一是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该交流机制设立于 2015 年，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设立的首个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对话。2015 年 5 月，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印尼雅加达举行，双方签署教育、科技、文化等 7 项合作文件。2016 年 6 月，作为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的务实合作项目，中国—印尼高校智库联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目前，智库联盟共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以及印度尼西亚大学、加查玛达大学、日惹国立大学、北苏门答腊大学等 8 个成员，主要任务是加强双向人才培养、推动科学研究、加强政策对话，围绕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具体政策开展针对性研究。2017 年 3 月，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2016 年 8 月，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中国贵州举行，两国领导人对深入开展人文交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签署了教育、科技、文化、林业等 8 个合作协议。二是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会。2013 年 6 月，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会在中国南宁举行，这是自 1991 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首次举行民间高端对话，对促进彼此的认知和了解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高度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民间交流。2015 年 5 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印尼出席第二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会，柬埔寨副首相索安、印尼前国会议长马祖基、东盟副秘书长穆克坦等政要及前政要、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代表等出席会议。与会领导人和专家对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间交流对话表示了高度肯定。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三年多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及社会人文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仍有误解和疑虑。如，印尼海事法专家贾拉尔（Hasyim Djalal）指出，中国要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相信印尼将从中受惠，但印尼要保持谨慎，要提防丝路倡议的军事目的，防止丝路计划演变为一种军事渗透手段。印尼国防大学国际关系与防务专家班塔多

（Bantarto Bandoro）警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本地区扩展影响力的战略，带有幕后动机。印尼应该谨记，这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只要中国和多个东盟国家还未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丝路倡议就难有落实的希望，而印尼不应该为中国所利用，说服其他东盟国家与中国合作。再如，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一些专家和学者担心“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担心其背后是否有军事目的，中国会不会在东亚地区称霸。但从过去三年多的情况看，尽管南海问题给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造成困扰，但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稳步推进，已经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目前，中菲关系转圜，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积极向好。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进一步走向深入。双方合作可能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经贸合作将继续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长期以来，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不断走向深入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与东盟关系也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断走向深化的。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排在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随着双方大型合作项目，如铁路公路互联互通、工业园区建设、经济走廊建设等项目的逐步落实，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投资、金融合作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增强，这将为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人文交流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柱，并将支撑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深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相近，民间交流自古代以来就密切不断，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天然纽带。2003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项目建设的开展，人文交流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并成为继经贸合作之后，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的又一重要支柱。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人文交流项目，尤其是双方之间的高校合作、留学生教育、智库合作、青年交流、文明对话、语言文化学习将逐渐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基石，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也将成为新时期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压舱石。

最后，中国与东盟将引领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将走向深入。作为未来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大战略力量，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亚的未来。而“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和平、合作、发展、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与中国和东南亚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并渗透到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方方面面。中国与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将引领东亚地区走向和平、稳定和繁荣，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合作、互利、共赢理念将塑造未来地区间合作的新理念。

（摘自《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5期）

用钉钉子精神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此次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也是2017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一倡议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接下来又如何进一步展开？企业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围绕这些问题，本报特邀请相关部委、智库、企业家进行“三方会谈”。

主持人 王翠娟

学习时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三年多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请您概述一下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欧晓理：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到2014年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正式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影响和建设成效远超预期。

从国内来看，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国研究制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规划，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作出了顶层设计，绘制了宏伟蓝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与许多国家开展了战略对接，达成了许多共识；国内各方面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持续高涨，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有序展开，一些重要专项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目前国内，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办公室统筹协调，地方部门分工负责，以企业为主体的推进工作机制已经形成。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一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一些国家的积极响应。由于“一带一路”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国内各方面的努力，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表达了希望参与这一进程的意愿，中国已经跟40多个国家签署了5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协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预计这一数字还会实现一个大的跃升。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双核心”，中老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启动实施，与沿线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国际产能合作，沿线50多个国外产业园区建设顺利，中白工业园、泰国罗劳工业园等国外园区加快发展，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同时，一些人文交流、民间交往等也在同步开展，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势”已然成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11月17日，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提出欢迎“一带一路”等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4个月后的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做出一项决议，提出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这些都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总书记讲三年成绩“远超预期”，的确是这样。最开始在做这一规划时，我们也曾对其发展做过

一些预判、预估，认为五年后可能会取得比较多的共识，但目前三年多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现在看来，当初我们保守了。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逐步过渡到基本框架更加清晰、工作方式更加明确、合作共识更加广泛、建设成果更加丰富以及“朋友圈”不断扩充的新阶段。在取得这么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要看到下一步工作推进的难度，我曾讲过一句话，“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工作的难度比之前肯定会加大。这需要我们更加努力，要有战略定力，按照顶层设计的蓝图，一张蓝图干到底，用钉钉子的精神，把各项工作做好。

赵可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果超出预期。具体来说，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完成了顶层设计。2015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大致完成，“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进入常态化。二是逐步明确了重点方向、重点区域、重点国别和重点项目。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过程中，中国明确了六条经济走廊的建设方向，东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成为中国重点推进的区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希腊、捷克等国家也成为中国重点合作的区域。中巴经济走廊、中俄黑瞎子岛国际自由岛、雅万高铁、泛亚铁路、匈塞铁路以及若干境外产业园区等应当是重点建设项目。三是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双边和多边对话。为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中国与40多个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对话讨论，签署了共建协议，与之相关的智库对话和民间交流更是如火如荼，“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在联合国、G20、APEC、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众多多边场合被反复提及，成为国际社会热烈讨论的议题，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

李跃平：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后，2014年的APEC峰会、2016年的G20峰会以及即将召开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均围绕这一战略而展开，其影响力势如破竹。按最初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但现在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而且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也呈上涨趋势。

学习时报：我们一直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由一国或者几国来主导，而是所有的国家都享有同等的发展机遇，目标是实现联动发展，合作共赢。为实现这一目标，您认为应着力解决好哪些主要问题？

欧晓理：虽然中国是“一带一路”的首倡者，但建设成果惠及各国。因为共建“一带一路”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是秉持丝路精神，追求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打造合作治理新体系的合作。

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就必须坚持“三共”原则，即共商、共建、共享。

共商解决的是“怎么建”的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中国强调要与相关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进行对接，寻求最大公约数，照顾相关国家的利益和关切。需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附加任何条件，讲平等合作，讲互利共赢，“先做朋友，后谈生意”。这与有的国家附带民主、人权等他们自认为“政治正确”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

共建解决的是“谁来建”的问题。我们强调要在更宽领域、更广范围、更高水平进行合作，坚持共同建设，利益、责任、命运系于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我们还强调第三方合作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与域外国家发挥各自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

共享解决的是“为谁建”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当然有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的利益同相关国

家的利益是捆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一带一路”建设是各国互利共赢的平台，而不是地缘战略的工具。

“一带一路”建设有八大合作领域，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投资合作，形象地说就是“两轮驱动”，以之来带动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沿线国家欠发达的国情，决定了其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共同诉求，因此，这两项合作恰好契合了这一诉求。

赵可金：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核心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国内版”转化成为“国际版”，将中国一方的“倡议”转化为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共识”。因此，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是值得考虑的选择项。

一是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常态化，并把筹建 OBOR 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中方可以考虑选择一批代表性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OR），并设立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工作组，具体负责章程起草、意见汇集和具体行政事务。筹备领导小组及其下设机构每年的工作可以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年度峰会汇报，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努力推动 OBOR 组织尽快成立。

二是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元首会议筹建理事会。将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整合起来，在元首峰会期间发表《多边联合公报》，将合作愿景和行动路线图确定下来，形成多边协同行动，并推动元首会晤机制化，依托元首峰会筹建 OBOR 理事会。

三是依托各种议题联盟建立专业委员会，在论坛期间对各议题领域的合作进行广泛讨论，并联合发布专题合作清单，引导后续的合作。同时，将各议题领域的政府部门代表和非官方代表采取众筹的方式，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为筹建 OBOR 所辖的各分委员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四是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和研究团队。建议中方和其他发起国共同商讨设立 OBOR 专项研究基金，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家学者、智库、法学的智力资源，为创制多边合作平台提供智慧支持。

五是依托亚洲大学联盟建立 OBOR 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建设，复合型高端人才是关键。建议依托亚洲大学联盟，积极推动建立 OBOR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面向未来培养“一带一路”高端人才。

六是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的行动型社会联盟。“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共识”，需要推动建立国际性的“一带一路”工商理事会、大学联盟、智库联盟、社会组织联盟等行动型社会联盟，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

李跃平：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国内解决什么、国际解决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系统方案来解决国际性的问题。

一是搞好公共外交。“一带一路”倡议的不信任者和反对者，既有恐惧症和忧虑症，又有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怎么办？一方面要让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了解“一带一路”的真实意图，我们是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但绝不是只予不取，中国当然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共同发展才是现实。

二是构建政府间的融资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市场规律办事，建立兼顾参与国的利益诉求，形成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共向目标的共赢机制。

三是推进中外企业间的广泛合作。中国企业绝不会“吃独食”，而是与各沿线国家企业尤其是当地企业，以产权合作、联合承包等多种形式实现互动发展。

学习时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到当前这个阶段，共识已经达成。企业、智库、华侨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您认为，企业、智库、华侨等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各自的作用或者定位是什么？

欧晓理：“一带一路”建设遵循了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的模式。推进“一带一路”战

略最重要的主体就是企业，企业开展好的项目，发挥好的效果，就能够产生最大的说服力。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要认识到每个在海外的中国企业，代表的都是中国的形象。

媒体和智库的最大作用在于讲对、讲准、讲好“一带一路”战略。因此，智库与媒体在研究宣传时要有敬畏之心，有责任地开展相关研究、发表相关看法。

华侨也是推进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力量。海外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需要进一步挖掘、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赵可金：目前，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接下来需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来统筹协调，建立大统筹、大协调和大合作的建设体制和运动机制。

一是法治化方向。“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国家，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其能否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具有强大的信心。要解决这一问题，法治是最可信赖的因素，也是最靠得住的因素，但最终还需要建立起一整套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才有保证。

二是机制化运作。“一带一路”建设重在协调，有大量的事务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考虑到复杂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的空间，尽可能将关系沟通转化为机制建设，将相关建设工作纳入机制化运行的轨道。

三是系统化管理。“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要从全方位、系统化管理的角度，加强顶层设计，促进管理政策、工作布局、后勤保障、考核评估等多方面的配套协作，逐步建立科学化的运作系统，从顶层设计、方式手段与综合保障等运作系统上实现突破。

与此同时，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切实管理好自己，保证以“全国一盘棋”的格局进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其中，要加强政府引导，完善统筹协调的立体化统筹领导体制和机制建设，形成内外结合、部级协调、央地联动、官民并举的体制和机制，以充分发挥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角色。

李跃平：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和智库等四种力量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主体。

政府的主要作用和任务有：一是在国家层面做好公共外交。二是构建合作机制。沿线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需求千变万化，必须针对各国情况精准化、差异化地做好规划，建立合作机制。三是构建政策体系，形成“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制度保障。

企业的作用和任务。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力量，是这一战略实施的先锋队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冲锋队。中国企业必须以自己的建设能力、技术能力、制造能力、价格定位、相对的标准规则、相对的资本实力等优势，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产品，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靠的公共产品。

社会力量主要指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正能量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他们不但可以弥补我们的人才短板，还可以利用他们“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广泛整合国别政治、经济资源。

智库的作用和任务主要在于：一是形成学术共识。“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战略，学术理论的作用首先在于阐释其理论意义，进而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二是促成民众共识，认识到“一带一路”实质上是全球利益共享的战略。三是推动科学决策。智库不能制定政策，但能影响决策，会以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和精准性。

学习时报：企业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主体，在参与国家的投资与建设中作用十分巨大。但中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保障其主体作用的发挥？

欧晓理：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各类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要为他们参与建设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在接下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还需着重解决企业在相关项目上的竞争问题。在这方面，国外很多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日本，如果有日本企业已经参与了该项目，其他企业就会自动回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行业协会等机构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企业在开展建立联盟等相关的探索，来减少中资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接下来，需积极培育第三方力量，保障企业有序开展相关项目的建设。

赵可金：推动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制度创新是关键。

一是包容式互联互通。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开放平台，“一带一路”制度互联互通可以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经济开发区、跨境合作区等多种形式，建立一些实行新制度办法的“制度特区”来实现制度性互联互通。

二是嵌入式互联互通。与包容性互联互通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同，嵌入式互联互通更强调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新功能系统，所有的制度框架、具体规范和管理人员都不做任何变化，不改变现有制度的基础，而是在现有制度体系内嵌入一种新的制度功能，尝试采取“老人新角色”的办法，在一些新增的问题上设置新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铁路管理体系中，可以不动摇原有的制度体系和管理队伍，但在跨境列车这一个议题上实行特殊的新制度规定，探索一站式通关的管理体系。这种做法在没有触动原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实施了新制度规定，也是解决互联互通的一个办法。

李跃平：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企业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恶性竞争的现象。二是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往往是点对点的，不是编队出海，缺少符合有关国别需求的系统布局和产业链的整体协同。

因此，为使企业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应实现制度的转变，核心就是要形成企业自组织、自协调、自协同的组织体系，也就是各企业间应形成具有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的战略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交易和创新的激励机制，基本原则应是市场导向、企业运作、政府推动、过程监管。

对此，我有三项建议：一是将参与战略联盟运作的情况纳入国有企业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之中。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决定着企业联盟的成败。因此，根据各国有企业在战略联盟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进行业绩考核评价，就能够形成激励和约束。二是应加强组织规划的制定。规划要从高处着眼，达到重塑国际分工的目的；从实处着手，细分合作领域和需求，分行业制定规则，与合作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三是建立项目信息供给机制。具体地说，就是建立重点区域和国别的项目信息收集、处理、集成和定期反馈机制。

（摘自《学习时报》2017年5月8日）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为进一步与沿线国加强战略对接与共同行动,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实现人海和谐、共同发展,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共筑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特制定并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一、时代背景

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空间和宝贵财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等合作日益紧密,发展蓝色经济逐步成为国际共识,一个更加注重和依赖海上合作与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独行快,众行远”。加强海上合作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与开放合作大势,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趋紧密、互惠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危机挑战、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

中国政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海洋领域的落实,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一道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海上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建立积极务实的蓝色伙伴关系,铸造可持续发展的“蓝色引擎”。

二、合作原则

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尊重沿线国多样化的海洋发展理念,照顾彼此关切,弥合认知差异,求大同,存小异,广泛协商,逐步达成合作共识。

开放合作,包容发展。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增强政治互信,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倡导包容发展、和谐共生。

市场运作,多方参与。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支持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推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团、工商界等广泛参与海上合作。

共商共建,利益共享。尊重沿线国发展意愿,兼顾各方利益,发挥各方比较优势,共谋合作、共同建设、共享成果,促进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形成海上合作的利益共同体。

三、合作思路

以海洋为纽带增进共同福祉、发展共同利益，以共享蓝色空间、发展蓝色经济为主线，加强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战略对接，全方位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大通道，共同推动建立海上合作平台，共同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沿着绿色发展、依海繁荣、安全保障、智慧创新、合作治理的人海和谐发展之路相向而行，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根据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密切与沿线国的合作，连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衔接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

四、合作重点

围绕构建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创新合作模式，搭建合作平台，共同制定若干行动计划，实施一批具有示范性、带动性的合作项目，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创依海繁荣之路，共筑安全保障之路，共建智慧创新之路，共谋合作治理之路。

（一）共走绿色发展之路

维护海洋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国政府倡议沿线国共同发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提供更多优质的海洋生态服务，维护全球海洋生态安全。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加强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海洋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建跨界海洋生态廊道。联合开展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视监测、健康评价与保护修复，保护海岛生态系统和滨海湿地，举办滨海湿地国际论坛。

推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加强在海洋环境污染、海洋垃圾、海洋酸化、赤潮监测、污染应急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海洋污染防治和应急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海洋环境评价，联合发布海洋环境状况报告。建立中国—东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与行动计划框架下，推动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倡议沿线国共同发起和实施绿色丝绸之路使者计划，提高沿线各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能力。

加强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推动开展海洋领域的循环低碳发展应用示范。中国政府支持沿线小岛屿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愿意在应对海洋灾害、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支持沿线国开展海岛、海岸带状况调查与评估。

加强蓝碳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倡议发起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碳计划，与沿线国共同开展海洋和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监测、标准规范与碳汇研究，联合发布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碳报告，推动建立国际蓝碳论坛与合作机制。

（二）共创依海繁荣之路

促进发展、消除贫困是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促进蓝色经济发展，共享美好生活。

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合作。与沿线国合作开展资源调查、建立资源名录和资源库，协助沿线国编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引导企业有序参与海洋资源开发项目。积极参与涉海国际组织开展的海洋资源调查与评估。

提升海洋产业合作水平。与沿线国共建海洋产业园区和经贸合作区,引导中国涉海企业参与园区建设。实施一批蓝色经济合作示范项目,支持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海水养殖,改善生活水平,减轻贫困。与沿线国共同规划开发海洋旅游线路,打造精品海洋旅游产品,建立旅游信息交流共享机制。

推进海上互联互通。加强国际海运合作,完善沿线国之间的航运服务网络,共建国际和区域性航运中心。通过缔结友好港或姐妹港协议、组建港口联盟等形式加强沿线港口合作,支持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沿线港口的建设和运营。推动共同规划建设海底光缆项目,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

提升海运便利化水平。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围绕规范国际运输市场、提升运输便利化水平等方面紧密合作。加快与有关国家在口岸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信息互换等方面的合作。

推动信息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共建覆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传输、处理、管理、应用体系以及信息标准规范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为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提供公共平台。

积极参与北极开发利用。中国政府愿与各方共同开展北极航道综合科学考察,合作建立北极岸基观测站,研究北极气候与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开展航道预报服务。支持北冰洋周边国家改善北极航道运输条件,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利用。愿同北极有关国家合作开展北极地区资源潜力评估,鼓励中国企业有序参与北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加强与北极国家的清洁能源合作。积极参与与北极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

(三) 共筑安全保障之路

维护海上安全是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保障。倡导互利合作共赢的海洋共同安全观,加强海洋公共服务、海事管理、海上搜救、海洋防灾减灾、海上执法等领域合作,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共同维护海上安全。

加强海洋公共服务合作。中国政府倡议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计划,倡导沿线国共建共享海洋观测监测网和海洋环境综合调查测量成果,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海洋观测监测基础设施的技术和设备援助。中国政府愿加强北斗卫星导航和遥感卫星系统在海洋领域应用的国际合作,为沿线国提供卫星定位和遥感信息应用与服务。

开展海上航行安全合作。中国政府愿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参与双多边海上航行安全与危机管控机制,共同开展打击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活动,共同维护海上航行安全。

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在国际公约框架下,中国政府愿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加强与沿线国信息交流和联合搜救,建立海上搜救力量互访、搜救信息共享、搜救人员交流培训与联合演练,提升灾难处置、旅游安全等海上突发事件的共同应急与行动能力。

共同提升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倡议共建南海、阿拉伯海和亚丁湾等重点海域的海洋灾害预警报系统,共同研发海洋灾害预警报产品,为海上运输、海上护航、灾害防御等提供服务。支持南海海啸预警中心业务化运行,为周边国家提供海啸预警服务。推动与沿线国共建海洋防灾减灾合作机制,设立培训基地,开展海洋灾害风险防范、巨灾应对合作研究和应用示范,为沿线国提供技术援助。

推动海上执法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对话,管控分歧,在双多边框架下推动海上执法合作,建立完善海上联合执法、渔业执法、海上反恐防暴等合作机制,推动构筑海上执法联络网,共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与沿线国海上执法部门的交流合作,为海上执法培训提供必要帮助。

(四) 共建智慧创新之路

创新是引领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深化海洋科学研究、教育培训、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增进海洋认知,促进科技成果应用,为深化海上合作奠定民意基础。

深化海洋科学研究与技术合作。与沿线各国共同发起海洋科技合作伙伴计划，联合开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海域和通道科学调查与研究、季风—海洋相互作用观测研究以及异常预测与影响评估等重大项目。深化在海洋调查、观测装备、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食品技术、海上无人机、无人船等领域合作，加强海洋技术标准体系对接与技术转让合作，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海外技术示范和推广基地。

共建海洋科技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共建海洋研究基础设施和科技资源互联共享平台，合作建设海洋科技合作园。推进亚太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东盟海洋学院、中国—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海岸带可持续管理合作中心、中马海洋联合研究中心、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巴联合海洋研究中心、中以海水淡化联合研究中心等建设，共同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共建共享智慧海洋应用平台。共同推动国家间海洋数据和信息产品共享，建立海洋数据中心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网络，共同开展海洋数据再分析研究与应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和海洋气候数据中心。共同研发海洋大数据和云平台技术，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海洋公共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开展海洋教育与文化交流。继续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计划，扩大沿线国来华人员的研修与培训规模。推动实施海洋知识与文化交流融通计划，支持中国沿海城市与沿线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加强与沿线国海洋公益组织和科普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弘扬妈祖海洋文化，推进世界妈祖海洋文化中心建设，促进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考古与发掘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沿线国互办海洋文化年、海洋艺术节，传承和弘扬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

共同推进涉海文化传播。加强媒体合作，开展跨境采访活动，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媒体朋友圈。创新传播方式，共同打造体现多国文明、融合多语种的媒介形态。携手开展涉海文艺创作，共同制作展现沿线各国风土人情、友好往来的文艺作品，夯实民意基础。

（五）共谋合作治理之路

建立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是推动海上合作的有效渠道。加强战略对接与对话磋商，深化合作共识，增进政治互信，建立双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参与海洋治理，为深化海上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建立海洋高层对话机制。与沿线国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磋商与对话机制，推动签署政府间、部门间海洋合作文件，共同制定合作计划、实施方案和路线图，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实施。推动建立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高层对话机制，共同推动行动计划实施，共同应对海洋重大问题。办好中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议、中国—南欧国家海洋合作论坛。

建立蓝色经济合作机制。设立全球蓝色经济伙伴论坛，推广蓝色经济新理念和新实践，推动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共同制定并推广蓝色经济统计分类国际标准，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开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蓝色经济评估，编制发布蓝色经济发展报告，分享成功经验。打造海洋金融公共产品，支持蓝色经济发展。

开展海洋规划研究与应用。共同推动制定以促进蓝色增长为目标的跨边界海洋空间规划、实施共同原则与标准规范，分享最佳实践和评估方法，推动建立包括相关利益方的海洋空间规划国际论坛。中国政府愿为沿线国提供海洋发展规划相关培训与技术援助，为制定海洋发展规划提供帮助。加强与多边机制的合作。支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下，建立海洋合作机制与制度规则。支持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东亚海环境合作伙伴、环印度洋联盟、国际海洋学院等发挥作用，共同组织推进重大计

划和项目。

加强智库交流合作。推动沿线国智库对话交流，合作开展战略、政策对接研究，共同发起重大倡议，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智力支撑。中国政府支持国内智库与沿线国相关机构和国际性海洋组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智库联盟，打造合作平台与协作网络。加强民间组织合作。鼓励与沿线国民间组织开展海洋公益服务、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知识传播等活动，推动民间组织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参与海洋治理。

五、积极行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有关国家的海上合作，加强战略沟通，搭建合作平台，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总体进展顺利。

高层引领推动。在中国与相关国家领导人的见证下，与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南非等国签署了政府间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和联合声明，与多个沿线国开展战略对接，建立了广泛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搭建合作平台。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等机制下建立了蓝色经济论坛、海洋环保研讨会、海事磋商、海洋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等合作机制。相继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世界妈祖海洋文化论坛等一系列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活动，对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海上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大资金投入。中国政府统筹国内资源，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基金，实施《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对重大海上合作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推进内外对接。中国政府鼓励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等经济区和沿海港口城市发挥地方特色，加大开放力度，深化与沿线国的务实合作。支持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海洋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推进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启动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促成项目落地。马来西亚马六甲临海工业园区建设加紧推进。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运营能力提升，港口自由区建设、招商工作稳步推进。缅甸皎漂港“港口+园区+城市”综合一体化开发取得进展。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有序推进。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铁路建成通车，肯尼亚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即将通车。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已建设成为重要的中转枢纽港。中国与荷兰合作开发海上风力发电，与印尼、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的海水淡化合作项目正在推动落实。海底通信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高，亚太直达海底光缆（APG）正式运营。中马钦州—关丹“两国双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园区建设成效显著。

展望未来，中国政府愿用信心和诚意与沿线各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谋发展，共同行动，珍爱共有海洋，守护蓝色家园，共同推动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

（摘自中国政府网2017年6月20日）

习近平“大数据”描绘丝路远景



（资料来源：<https://www.yidaiyilu.gov.cn/jcsj/dsjkydyl/13474.htm>）

“一带一路” 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7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贸易合作总体格局

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贸易合作中的总体格局

(1) 从总体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全球比重达 21.7%

“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 GDP 之和预测为 12.0 万亿美元, 占全球 GDP 的 16.0%; 人口总数为 32.1 亿人, 占全球人口的 43.4%; 对外贸易总额为 71885.5 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1.7%, 份额相比 2015 年降低 0.4 个百分点。如图 1-1、图 1-2、表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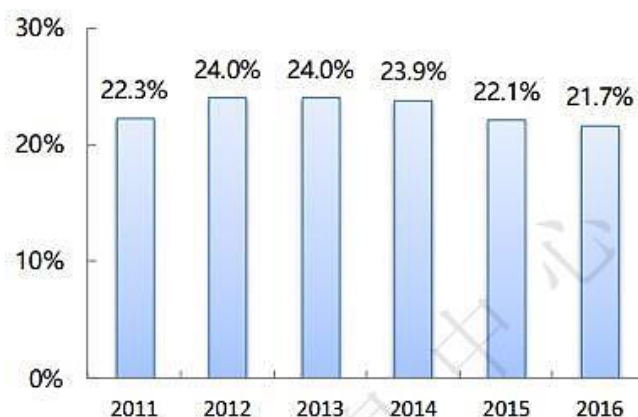


图1-1 201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占全球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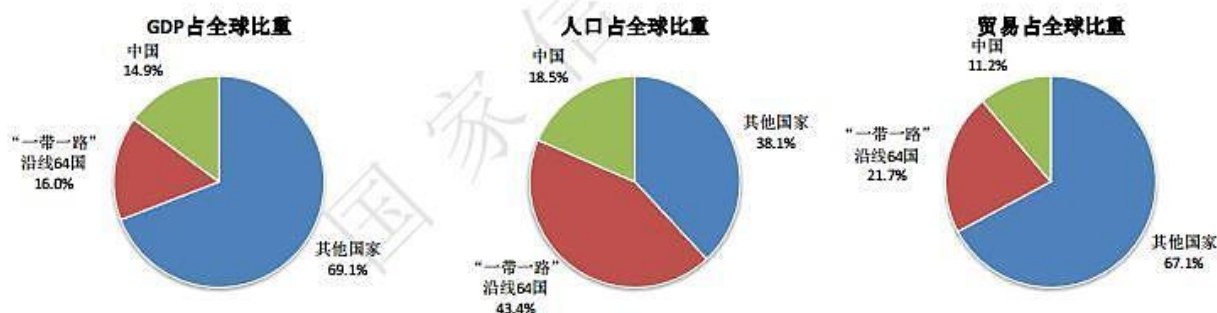


图1-2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GDP、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

表1-1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国人口、GDP、贸易情况(单位:万人、亿美元)

区域	国家	人口	GDP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出口总额
东亚 1国	蒙古	301.4	116.5	38.7	45.0	83.7
	区域小计	301.4	116.5	38.7	45.0	83.7
东南亚 11国	新加坡	558.4	2945.6	2968.9	3468.1	6436.9
	泰国	6898.1	4097.2	1957.4	2136.1	4093.5
	越南	9263.7	2013.6	1909.5	1865.0	3774.5
	马来西亚	3152.3	3092.6	1685.4	1895.7	3581.1
	印度尼西亚	25880.2	9369.6	1426.9	1502.8	2929.8
	菲律宾	10419.5	3103.1	859.4	563.1	1422.5
	缅甸	5225.4	740.1	219.1	131.1	350.2
	柬埔寨	1577.6	194.8	141.7	135.4	277.1
	文莱	42.3	91.0	32.4	63.4	95.8
	老挝	716.3	133.6	60.4	34.4	94.8
	东帝汶	118.7	21.0	6.1	3.4	9.5
	区域小计	63852.5	25802.2	11267.2	11798.6	23065.8
南亚 8国	印度	130971.3	22887.2	3566.8	2610.1	6176.9
	孟加拉国	16151.3	2262.6	392.3	354.5	746.8
	巴基斯坦	18987.0	2699.7	439.9	220.9	660.8
	斯里兰卡	2125.2	848.1	189.7	104.4	294.1
	尼泊尔	2875.8	218.7	66.1	6.6	72.7
	阿富汗	3273.9	172.8	45.0	8.2	53.2
	马尔代夫	35.4	32.8	19.1	1.4	20.6
	不丹	79.1	24.8	5.1	2.3	7.5
	区域小计	174499.0	29146.6	4724.1	3308.5	8032.6
中亚 5国	哈萨克斯坦	1794.7	1161.5	194.4	418.5	612.9
	乌兹别克斯坦	3134.3	616.5	99.3	56.5	155.8
	土库曼斯坦	546.3	354.0	55.0	92.7	147.7
	吉尔吉斯斯坦	605.9	60.3	39.2	15.4	54.6
	塔吉克斯坦	865.5	62.5	34.9	7.5	42.5
	区域小计	6946.7	2254.7	422.7	590.7	1013.4
西亚 北非 19国	阿联酋	985.6	3251.4	2221.8	1533.8	3755.6
	沙特阿拉伯	3201.3	6182.7	1638.2	2014.9	3653.1
	土耳其	7855.9	7511.9	1986.0	1426.1	3412.1
	以色列	852.8	3061.9	620.7	640.6	1261.3
	卡塔尔	257.8	1708.6	326.1	779.7	1105.8
	埃及	9020.3	3307.7	659.4	211.9	871.3
	科威特	422.5	1062.1	319.1	551.6	870.7
	伊拉克	3606.7	1484.1	314.6	531.0	845.6
	伊朗	8046.0	3861.2	438.6	383.2	821.8
	阿曼	395.7	516.8	290.1	319.3	609.3
	巴林	131.9	300.8	163.4	136.8	300.2
	约旦	697.6	398.0	200.4	78.6	279.0
	阿塞拜疆	949.2	351.4	100.8	160.6	261.4
	黎巴嫩	459.7	528.0	161.6	21.4	183.0
	格鲁吉亚	367.8	139.4	87.8	18.2	106.0
	也门	2913.2	373.1	62.6	19.5	82.1
	亚美尼亚	299.1	107.7	32.3	17.8	50.1
	叙利亚	341.8	1850.2	44.5	4.6	49.1
	巴勒斯坦	2699.7	470.5	7.5	1.1	8.6
	区域小计	43504.6	36467.5	9675.5	8850.7	18526.1
东欧 20国	俄罗斯	14630.0	11327.4	1827.8	3439.1	5266.9
	波兰	3800.3	4735.0	1885.2	1964.6	3849.7
	捷克	1056.1	1852.7	1422.0	1628.3	3050.3
	匈牙利	983.5	1177.3	877.9	961.0	1838.8
	斯洛伐克	541.8	898.0	702.1	726.8	1429.0
	罗马尼亚	1986.9	1819.4	698.5	598.5	1297.0
	乌克兰	4250.1	835.5	351.1	384.4	735.4
	斯洛文尼亚	206.5	437.9	284.5	309.8	594.2
	立陶宛	287.5	430.2	271.9	249.4	521.3
	白俄罗斯	945.1	458.9	274.6	234.1	508.8
	保加利亚	712.6	493.6	268.2	234.5	502.7
	塞尔维亚	713.2	373.8	192.2	148.4	340.6
	克罗地亚	420.4	499.3	202.0	129.6	331.6
	爱沙尼亚	131.2	238.5	149.5	131.7	281.3
	拉脱维亚	197.6	281.8	130.7	113.0	243.6
	波黑	385.4	163.2	67.6	47.8	115.4
	马其顿	207.6	104.2	64.0	44.9	108.9
	阿尔巴尼亚	288.5	122.7	43.2	19.3	62.5
	摩尔多瓦	355.3	60.8	39.9	19.7	59.5
	黑山	62.3	41.8	22.6	3.5	26.2
	区域小计	32161.9	26352.1	9775.5	11388.4	21163.9

(2) 从区域看, 东南亚、东欧、西亚北非地区的贸易比重相对较大

在贸易总额方面, 2016 年, 东南亚地区贸易额为 23065.8 亿美元, 占沿线 64 个国家贸易总额的 32.1%; 其次为东欧地区, 贸易额为 21163.9 亿美元, 占比为 29.4%; 第三为西亚北非地区, 贸易额为 18526.1 亿美元, 占比为 25.8%。在出口额方面, 东南亚地区最多, 为 11798.6 亿美元, 其次为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 分别为 11388.4 亿美元和 8850.7 亿美元。在进口额方面, 东南亚地区最多, 为 11267.2 亿美元, 其次为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 分别为 9775.5 亿美元和 9675.5 亿美元。

(3) 从国别看, 新加坡、印度、俄罗斯、泰国、波兰外贸总量在沿线国家中居前五名

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与全球贸易额看, 2016 年, 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额最高, 达到 6436.9 亿美元; 其次为印度, 贸易额为 6176.9 亿美元; 俄罗斯排名第三, 贸易额为 5266.9 亿美元; 另外泰国、波兰、越南等国, 均小于 5000 亿美元。如图 1-3 所示。

从出口看, 新加坡、俄罗斯对外出口额最高, 分别为 3468.1 亿美元和 3439.1 亿美元, 其次为印度、泰国、沙特阿拉伯, 出口额均超过 200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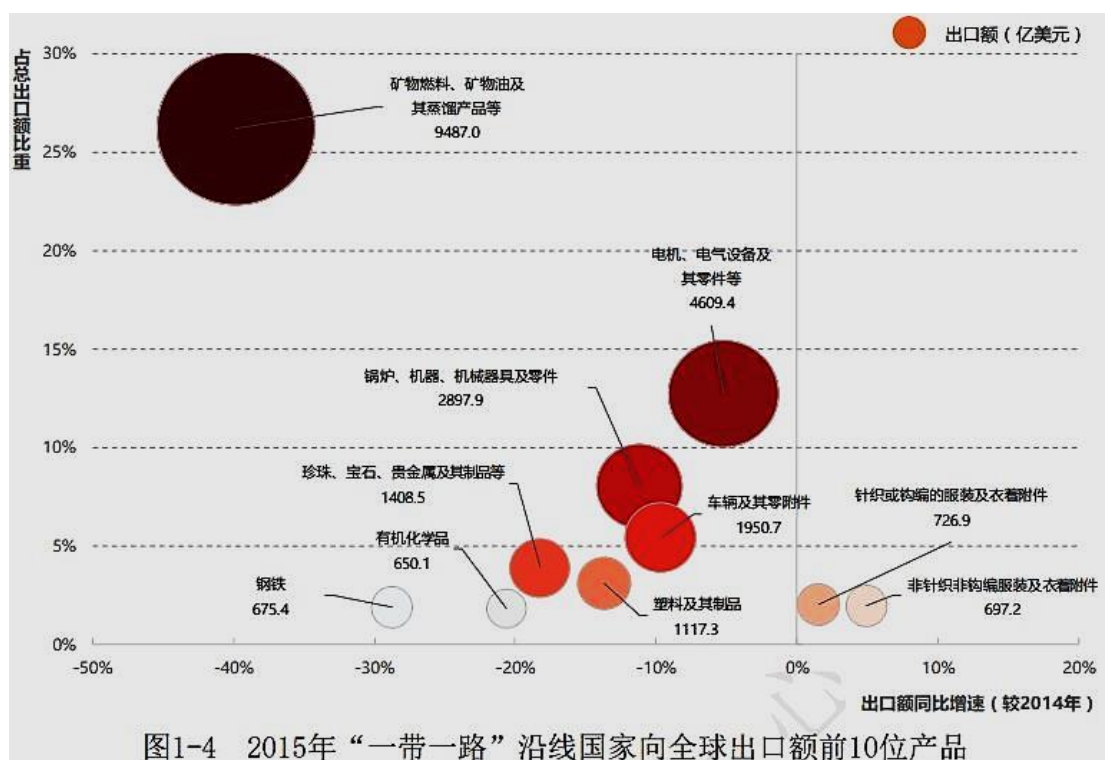
从进口看, 印度进口额最高, 为 3566.8 亿美元, 其次为新加坡、阿联酋, 进口额均超过 2000 亿美元。如图 1-3 所示, 图中国家为所有进出口额大于 1000 亿美元的沿线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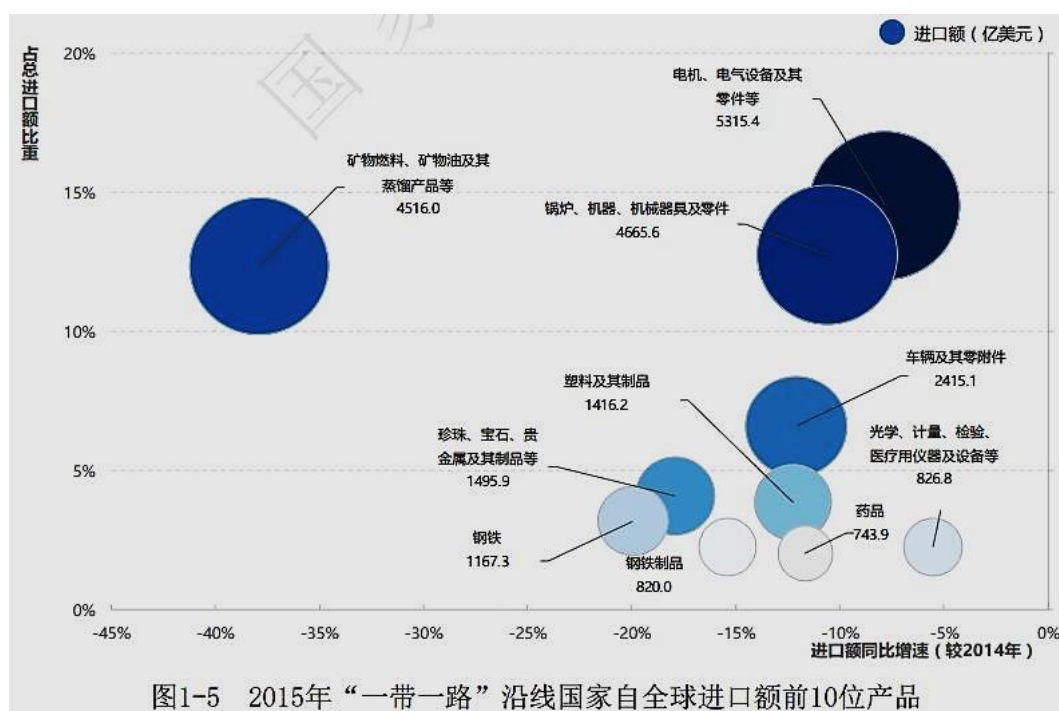
图1-3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贸易额排名前20国家（以进出口总额排序）

(4) 从商品类型看, 矿物燃料和电机电气设备是沿线国家主要外贸产品

从出口看,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是沿线国家出口额最大的产品。2015 年出口额为 9487.0 亿美元, 占当年沿线国家对外出口总额的 26.2%, 但下降幅度较大, 降幅达 39.9%; 其次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占比为 12.7%, 出现小幅下降, 降幅为 5.2%。贸易额排名前 10 位产品中, 仅有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非针织非钩编服装及衣着附件的出口额出现增长, 但增速都较低。如图 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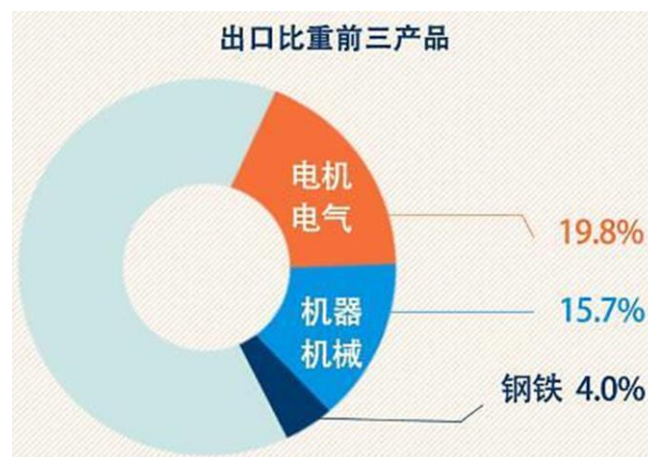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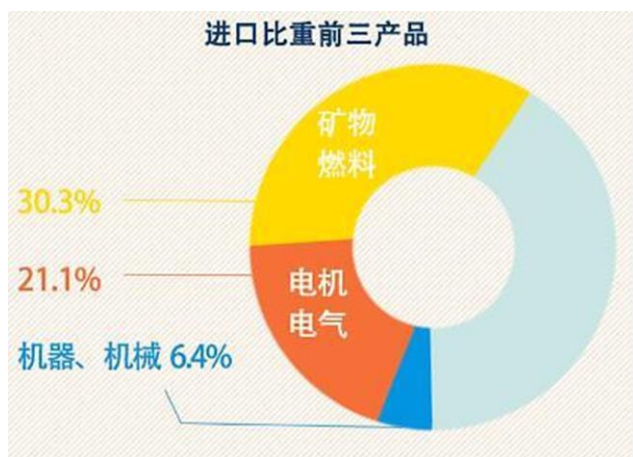
从进口看，“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是沿线国家自全球进口额最大的产品，2015年进口额为5315.4亿美元，占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14.6%；其次为“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和“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进口额分别为4665.6亿美元和4516.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8%和12.4%。贸易额排名前10位产品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降幅最大，达到37.9%，其他产品降幅在20%以内。如图1-5所示。



（更多数据内容，详见资料来源：

<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lgw/201703/201703241243039.pdf>）

数据解读：“一带一路”成国际贸易新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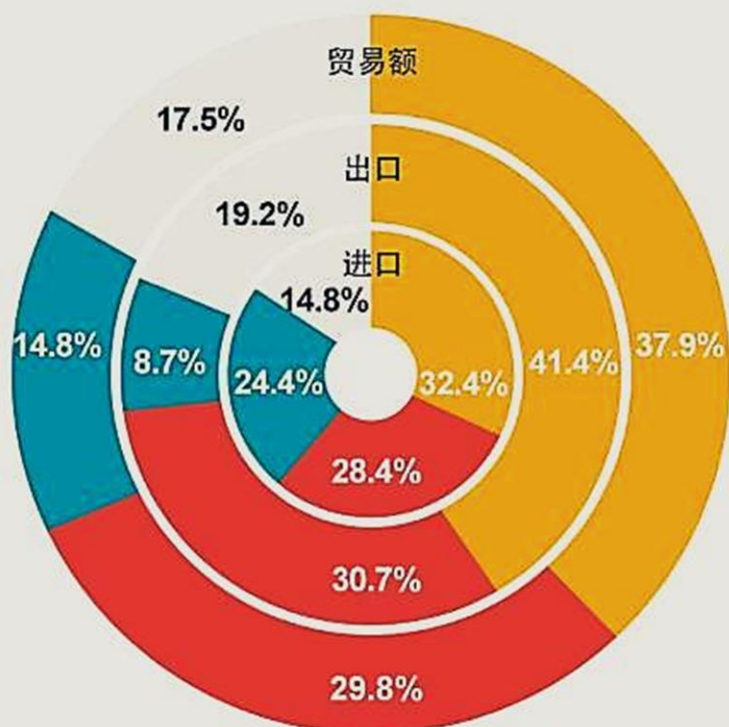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0787.htm>)

大数据解读：“一带一路”助力各省区市 对外贸易发展

贸易合作“主力军”：华东、华南、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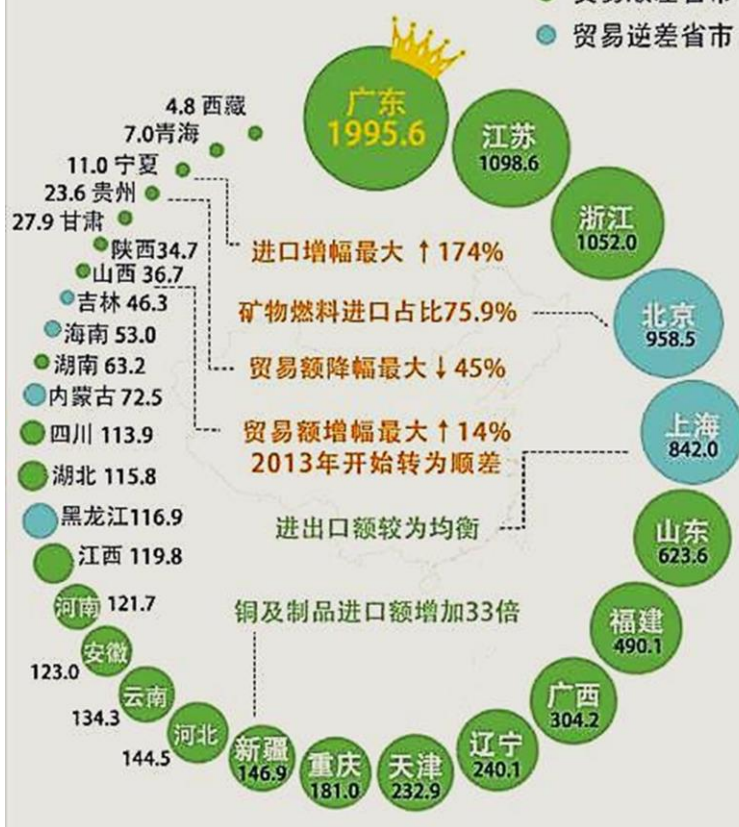
● 其他 ● 华东 ● 华南 ● 华北

2016年区域占比



贸易额：广东总量第一 山西增速最快

● 贸易顺差省市
● 贸易逆差省市



(资料来源: <https://www.yidaiyilu.gov.cn/jcsj/dsjkydyl/11135.htm>)

图解：习近平纵论“一带一路”

习近平纵论“一带一路”

人民网 图解新闻
兴业银行与您共同关注

编者按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此后，习近平在各大场合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阐述。

重大倡议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

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

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合作机制和平台

要重视国别间和区域间经贸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设计符合当地国情的投资和贸易模式，通过机制化安排推进工作。

——2014年11月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讲话

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2014年11月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讲话

亚投行是各成员国的亚投行，是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的亚投行。通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能成为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2016年1月16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致辞

建设进展

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们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3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资料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QyODA2OQ==&mid=2650131952&idx=1&sn=3a4b00e842840e41b0abeb20f77a195c&chksm=bee80dba899f84acb456cf18f0e79ffed79842d5b5a6f543d7cffe6fc1955a85e1fd10fb31&mpshare=1&scene=23&srcid=0510ikOCffjuAluVy65FNoCb#rd）

图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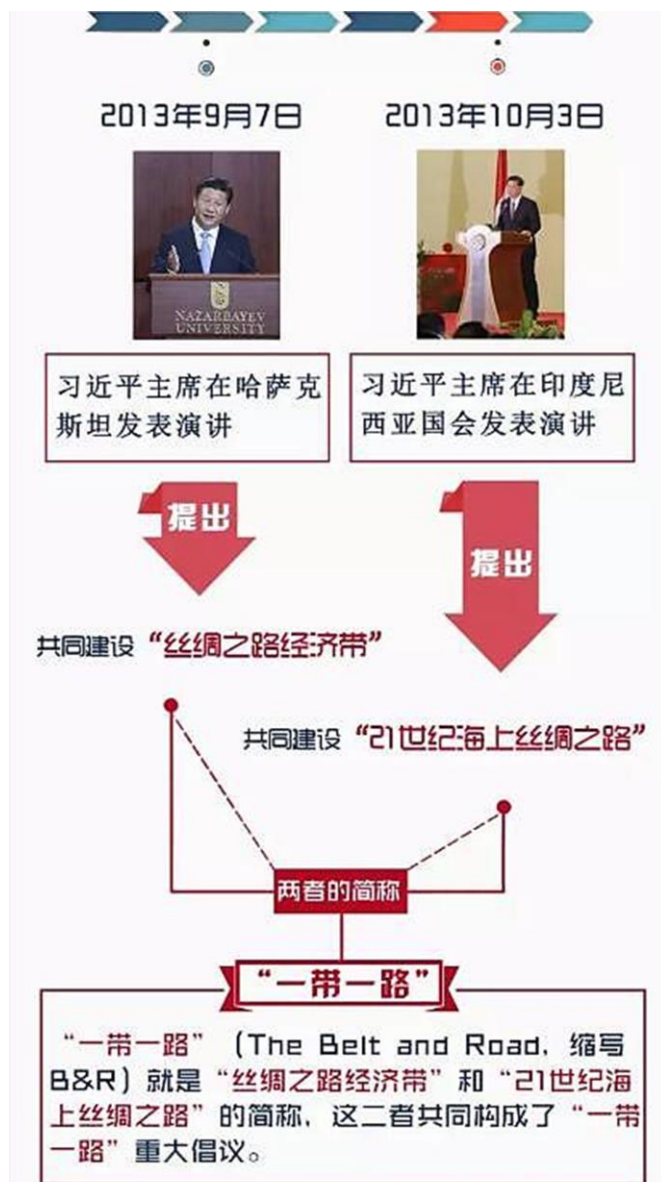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516/c1001-29277748.html>)

图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大工程项目盘点



(资料来源: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504/c1001-29253733.html>)

“一带一路”详尽图解



“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

有人说, 如今的“一带一路”是现代版的丝绸之路, 那咱就穿越回历史, 了解一下古代丝绸之路:



由来

发源于古中国, 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陆上商业贸易路线, 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狭义: 陆上
广义: 陆上 + 海上

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

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1. 陆上丝绸之路



(资料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biz=MjM5MzAzODkxMA==&mid=2651218306&idx=1&sn=2bf66d7cc285b35557fd18c4770018bb&chksm=bd6fd6d38a185fc5026f6365a55069eda837bad8e3135d3951f6dd735dfa6ad6576747e0e072&mpshare=1&scene=23&srcid=05159AD6Q2K9AjtGFEfJgAbW#rd>)